

的，朱培德來電 汪先生指定要中央派我至江西一行，大約他要我去的原因，第一我任江西政務委員會主任時，他正任江西總指揮，彼此有相知之雅，而且在廣東時候，彼此就合得來。第二我既是中央委員，而又在武漢。中央爲着這事終要派人調查處置的，與其派別人恐怕傳聞錯誤，不如我去處理還可以比較公平。我到江西之後，第三軍凡是公開的共產黨員都離開了，然而黨部、農會和工會還充滿共產黨分子。我告訴朱先生最好還是聽中央命令，萬不可輕於舉措；致又釀成長沙馬夜事變的怪劇，朱先生還老成持重，聽我的勸告。不過使我感覺奇怪的，朱德還是任他的教導團長，我問他爲什麼朱德可以留在第三軍，他說朱德有同鄉之誼，思想也比較純正，朱德是不會反他的。他自己既然有把握，我又事事聽之中央，還有什麼意見。不料南昌事變，就由朱德率領教導團，引導葉挺和賀龍暴動起來。迨至所謂行動委員會率領暴動隊伍由江西退至海陸豐時，朱德大概知到軍事必敗罷，把自己一團軍隊撤至廣東的北江，改名王明來依范石生師長。范石生是在民十一年跟楊希閔的滇軍由廣西東下驅逐陳炯明的，在我們解決楊劉時，范石生率師正企圖回滇，脫離楊希閔，駐兵廣西，所以不在解決之列，至到我們北伐，他也回了廣東駐防北江。范先生是雲南人，恐怕也如朱培德的見解罷，把朱德收容了，並且替朱德掩護了，但後來朱德知道江西共產黨入了瑞金，不獨把自

己的隊伍帶着走，並且把范先生的隊伍也拖了不少走，弄到范先生潰不成軍。後來范先生不知怎樣來到上海做起中醫，在黃膺白先生病危之時，我去看他時，在宏恩醫院碰見，矯矯的軍官一變而為恂恂的儒醫，人說不為良相當為良醫，而范先生則變為不為良將而為良醫了。

最奇怪的，共產黨的先生們對於有力量的人是怕的，對於客氣的人倒是攻擊最烈的，當時我們總以為政治的鬥爭不在於個人，而在於政綱，所以在武漢分共之時，非常客氣，雖然分共，同時還下令保護不違法的共產黨人，而共產黨首在南昌暴動，繼在廣東暴動，目的就在以政治方式鬥爭的我，和待其過厚的張發奎。在廣州暴動時，雖然尋不着我，却以廣東蘇維埃主席蘇兆徵的名義大張佈告，說已拿獲陳公博槍斃，那時我正在河南士敏土廠調兵遣將，過河的偵察兵送上那張佈告，我失笑起來，這種『亦且快意』的事，惟有幼稚的共產黨才做得出。

尤其奇怪的，在理論上共產黨倒不怕當日的南京，而最恨他們所謂國民黨左派——我自始至終沒有自稱過左派——因為他們以為右派是沒有理論是不怕的，惟有左派才有理論，所以深惡痛絕。在我失敗墮居上海辦革命評論時，共黨非常注意。共黨假名左翼的文藝刊物羣起對革命評論攻擊；那還不夠，更派許多共產分子潛入大陸大學讀書，有一次還想縱火燒燬大陸大學。就是大陸大學的

學生雙十節在上海天后宮開一個游藝會，共產黨還出動許多人擾亂會場。他們的計劃我預先接有報告的，但使我有些難於處置。那時我和南京已立於反對地位，決不願事急去求他們，我更不願報告租界的巡捕房，我不但不願求到外國人，而且租界當局已經對大陸大學含有敵意。但學生的游藝會早已宣布，勢難中止，好！自己辦罷，把一班學生分別配置在各據點，等他們傳單一散便動手拿人。人是拿到兩個，別的共黨同志們都鳥獸散了。那天晚上倒很布置得宜，台上的演劇還鑼鼓喧天，台下的觀眾還談笑自若，而將一場全武行於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中，平定下去了。今日上海的電影明星袁美雲就是當日在台上和他姊姊袁漢雲演投軍別窰的一個人，他那時還是九歲的童伶，現在已由平劇轉到電影，且作了明星了。倏忽又是十餘年，我想我真是老了罷！

自寧粵合作之後，我剛由海外歸來，參加南京政府，以後國共已由黨的鬥爭入於軍事鬥爭，個人和共黨直接上無甚可述。我到南京之後知道陳仲甫夫人高君曼女士貧病交困，我到過他的家中。她太淒慘了，住在城南一間草屋，臥病在床，傢具破碎不全，絮被也支離散爛。我真爲之淒然，祇有盡我所能的接濟她，君曼夫人因病久失醫，終於逝世，我又囑仲甫的朋友潘先生爲之營葬，草草盡一點朋友之責。

仲甫忽爲被捕禁在南京獄中，仲甫先生雖然被莫斯科認爲托洛斯基派而開除，但托洛斯基到底還是共產黨，所以依然被捕了。在未判罪之前，我入獄看過他一次，判罪以後，也看過他一次，仲甫先生在京的舊朋友很多，大家已忘記他是一個共產黨，還待他是對於新文化會有功勳的一個人，雖然名爲監禁，倒很自由和舒服。我見他時，真是頭髮禿白，形容憔悴，仲甫先生本來有些禿頂的，現在年力漸衰，更禿白可怕，我自然不願再提往事，祇是關心他的生活如何。仲甫又表示感謝我招呼君曼夫人，我祇有唯唯，心內有說不出的悽愴。中日事變，仲甫以政治犯的原故釋放了，一天我在佛海家裏和他吃飯，我們祇談中日問題，更不復談國共。我在廿七年十月底在大場失守的第二天奉命往意大利晤墨索里尼，廿八年二月歸抵漢口，自後更沒有機會相見，我在成都時還聽見他住在重慶附近鄉間。後來到了國府還都，佛海告訴我，仲甫也贊成和平，祇是無法脫離內地，不久便聽見仲甫逝世了。我們兩個人雖然有過一重公案，究竟沒有恩怨可言，聽見他逝世，不禁有人往風微之感，假使仲甫能來，或者我們還可以共同做一番事業也未可定呢！

譚平山呢，在漢口時我也見到了。以前我在南京實業部時，知道他住在歐洲比利時，他的困苦，大家是知道的，我曾接濟過他一次，對於他的兒女在滬求學，我也曾爲小小幫忙。人到中年，

哀樂備嘗，恩怨都了。平山爲人什麼都好，祇是責任心過輕。當日在上海他不替我辯誣，我想也不是存心搗我亂，恐怕是怕麻煩，他對黨事還是不大願負責，對於朋友閑事更是懶得管了，我早已不想做共產黨，這一段經過還是忘記算了。我們在漢口談過幾次，我的經過他大約全知道的，至於他的近狀我也不再問。兩人談談國事，一次我們還在一家飯館吃回魚，飲酒搵拳，歡笑如昔。我祇間接聽見他替蔣先生草過一個方案，因爲那個方案後來還交張羣先生修改，我也被邀參加的。平山年紀雖然祇比我大幾歲，但看來真老了，頭髮本來已鬢有二毛，我們相見時更斑白而稀少。酒量也減了，豪情也盡了，班荆道故，不禁感慨系之。

張國燾先生也在重慶相見了，我們知道他已脫離共產黨，還替蔣先生做反共的工作。國燾先生和我分別十七年，看他長得胖胖的，談起話來矜平躁釋，絕不像在上海開代表大會時那樣鋒芒，倒像言必規行必矩一個紳士。氣質真可以隨時代變化的，我於國燾先生尤可見之。

朱德和葉劍英也在我未赴歐前在佛海家見過了，佛海一天約我見見朱德和葉劍英，說他們已到南京，和他們談談也很有意思。一夜願祝同先生帶了他們來，朱德似乎矮了許多，顏色也蒼老，葉劍英還是舊時的神氣，沉默寡言。我想起葉先生在廣州暴動時要致我於死地，而今日倒客客氣氣的

談話，不由得心內好笑起來，但他們今日變了一個生客，我又怎能笑出口呢，祇好談些不着邊際的話。朱德說我不會老，大約是滋養料充足之故，我祇好微笑，人之易老與否大半原因在遺傳，但我又何必根據唯物史觀和他作遺傳學的辯論。葉劍英很沉默，一半是他的脾氣，一半大約也有些不好意思，我想他和我見面時，也會想到廣州當日兩方拼命廝殺的情形罷。

在漢口的參政會內，我見了不少共產黨人，參政會內有十個共產黨的代表，老朋友董必武、林祖涵、鄧穎超，全都在會場見過，但是除點頭之外，沒有交過言。那時在參政會內，我雖然不是參政員，但被指定爲國民黨參政員的指導者，張君邁先生笑我是英國國會的 Whipman，指導者的職務，他們是知道的，恐怕因此更不會和我有好感。

我參加和脫離共產黨的經過就是如此了。在西安事變之後，在廬山談話會之前，我在南京忽然接到錢大鈞先生由牯嶺來一個長途電話，說蔣先生要我到廬山，廬山本來被人認爲終南捷徑的，我自廿一年到南京，終我在實業部之任沒有到過，這次既然有要事，祇好一行。在廬山蔣先生和我談完一般事之後，說共產黨的人你有見過嗎？我說沒有見過。他問我還有熟人沒有，我說就有也祇是如林祖涵董必武舊人，若新進如陳紹禹等，我祇聞其名，未見其面，蔣先生默然，我也告退了。蔣

先生是不是要我和共產黨聯絡，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爲人不能用權謀術數，更不願見口是心非的朋友們。而且當時我已看透國共合作是一種把戲，共產黨抬出民族招牌也是一種把戲，我既不願而且不慣玩這套把戲，不要說主角我不來，就是跑龍套我也不幹，祇好在台下一個角落看看算了。現在重慶方面的國共鬥爭果然由溫火而至白熱了，我們且看看下文罷，然而爲着屢次的掉圍縱橫，中國的命脈也因此削弱盡了。

民國三十二年稿

改組派的史實

這篇紀事，與其喚做改組派的史實，不如喚做改組派的史略還來得切當，因為屢經變亂，一切文件都遺失了，改組同志會的名冊也燬滅了，甚至於革命評論的參考材料也不在手上，當時有許多言論足資印證的，也無從去找了。

改組派實在不是我們當日自己的稱呼，我們祇有『改組同志會』，而沒有什麼改組派，『改組派』三個字第一次出世的時候，還是蔣介石先生在北伐完成時北上在北京黨部歡迎會上罵出來的。關於改組派名稱的來源既已表明，以下便談改組派的史略。

許多人以為改組同志會的領導人是顧孟餘先生和我兩個人，至到今日，這重公案還未分明，其實這是傳聞失實，改組同志會的上級機關是所謂『粵方委員』，至於什麼是粵方委員，今日時代遼遠，社會人士已經淡然若忘，我祇好簡單一提，因為不知道有粵方委員，那麼便無從知道改組同志會的中樞機關。

粵方委員得名之由來，是在民國十六年底張發奎先生驅逐李濟琛先生之役。十六年寧漢合作，蔣介石先生下野，武漢的中央遂應李宗仁和白崇禧兩位先生之請，東遷至南京，但突然發生一個國民黨特別委員會，我們認爲這種舉動足以破壞國民黨的法統，於是汪先生和顧孟餘先生復西上廬山，我個人則回廣州。那時真可以說人心渙散，中樞失主。這種紛亂的局面，促成汪蔣第一次合作之局。汪先生不久便以李宗仁和唐生智構兵之故，不能在廬山靜養，重以李濟張發奎兩位之請，又行回粵。一般不滿於南京特別委員會的委員，如顧孟餘，王法勤，何香凝，王樂平，朱霽青，陳樹人，甘乃光先後來粵。

因於全黨各方面的要求，國民黨遂在上海召集第四次全體委員會預備會議，汪先生在粵偕李濟琛先生北上開會，在這個預備會中決定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取消南京特別委員會，第二件是蔣介石先生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在汪先生起程之第三日，張發奎軍起而驅逐李濟琛，這一段政治史的經過，我不想在此詳寫，而想將來有機會時再另文紀述。又越若干日而共產黨暴動，廣州淪於共產黨手內三日，然後由張發奎的第四軍和李福林的第五軍肅清，共產黨暴動和我們調兵遣將的情形，我已有一篇紀載，寫在我所著的『軍中環記』，我也不再說了。

自我們收復廣州之後，京滬方面起了極大的衝動，一切的攻擊都集中於我個人的身上，這個原因也很簡單，第一特別委員會雖然取消，而參與特別委員會的人物却依然盤據南京要津，認定反對特別委員會是我在那裏興風作浪，至此根據了有仇不報非君子的格言，向我攻擊。第二，廣西系下的軍人，如李濟琛，白崇禧，黃紹竑各先生，以及胡漢民先生系下的要人，蘊着廣州驅李運動的新恨，至此有詞可藉，痛快一下向我下個總反攻。第三，就是蔣介石先生底下的人，雖然知道汪蔣合作，雖然知道張發奎軍的崛起反李是蔣先生所預知，然而附和着攻陳，總是一種正中下懷而無傷大雅一件事。因此萬方有罪，罪在陳公博一人，張發奎因爲是一個軍人，倒被諒解了，而陳公博倒因爲是一個文人而罪無可恕。

當時在廣州方面，軍事已處於夾攻的絕地，廣西和二陳以靖亂爲名，陳銘樞和陳濟棠的軍隊自潮汕移師西下，而黃紹竑的軍隊自梧州奉令東征，張發奎的軍隊交給薛岳帶往東江，我則偕張發奎下野，以謝疏於防共和失守廣州之咎。在京滬方面，政治更處於環攻窘境，最奇怪的，是一般政論——還不敢稱爲輿論——不責備我驅李，不責備我失守廣州，更不責備我消滅共黨恢復廣州爲有罪，而說我是勾通共黨焚殺廣州。我在廣州那時的確有些灰心，固然失察之咎，罪無可辭，然而軍

事握於黃琪翔手中，似乎張發奎也不能過問，政治則談不上建設，一切所謂廳長縣長不是軍隊中人，就有濃厚的軍隊背景，我想應該下野罷，所以我絕無猶疑，翩然引退，遂至滬上。

我來上海大約是十七年一月二十五六，那時的心情，非常消極，眼見政治是失敗了，革命也消沉了，蟄居貝勒路幾個月，日夕所思索的，是如何可以使革命復興。當時也不想至南京，也不想遊海外，而是深思焦慮，怎樣可以在清黨之外，更把共產理論肅清。然而主觀上黨不健全，而想消滅共黨，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考慮結果，還在國民黨本身檢討。那時孫伏園先生在上海辦了一個雜誌喚做『貢獻』，是一個文藝的刊物，我檢討國民革命的失敗，認為國民革命途中我們有了不少錯誤，所以草了一篇『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登在『貢獻』。

不想這篇文章發生了各方面的反應，一般國民黨的少壯派認為這篇文章是國民革命以來第一次的總檢討，由是很像洛鐘東應，銅山西崩，更有許多黨員要求我辦一個刊物，以為各黨員發表意見的園地。其實當時國民黨的黨員也太煩悶了。清黨是贊成的，但一般元老以為清黨便萬事皆了，對於共產黨的理論和宣傳是無人過問的。絕俄是贊成的，然而革命路線應否改變，也是無人去討論的。國民黨已暮氣沉沉，很有民元由興中會改黨，變了官僚軍閥集團的氣象。一班元老或者沒有這

些感覺，而少壯青年們關心革命前途的，至少認為有圖挽救之必要。

『辦刊物』，『辦刊物』，已成了一班革命黨員要求的聲浪，『革命評論』週刊便在這個要求聲浪中，於民國十七年五月間出世。在出版的當時，我們也有過一些討論，我主張一切文章要堂堂正正自己署名，而顧孟餘先生則主張用化名，這個不同主張，經過若干次討論，還沒有結果，最後決定我還辦我的『革命評論』，顧先生辦他的『前進』。革命評論的陣營，有許德珩、施存統、劉侃元、蕭淑宇，最後加入黃惠平。前進的陣營，有潘雲超、王樂平，此外還有許多化名的黨員，這樣在野國民黨員的刊物便出世了。

革命評論的態度，并不像外間所傳是左派的刊物，也不像外間所傳有過激的理論，據我最公平的批判，是一個不隱飾，不避諱的合理批評和貢獻。我的爲人，當時也有人上我尊號是『準共產黨』，也有人恭維我是極端左翼。但是我最是中庸不過的，因爲我每每批評一事，必定先自己想，假使我辦這件事不是這樣，能不能那樣，如果我想過辦不通，我必不批評。同樣的每每批評一個人，也必定自己想想，假使我設身處地是不是這樣，能不能那樣，如果我想過做不到，我也不批評。我一生固沒有試過虛構謠言，以便政治上的私圖，也沒有試過責人太嚴，強其任自己不能辦

之事。無如當日南京當局最討厭的是合理的批評和貢獻，因為肆口謾罵終不會有人同情，妄做謠言終與事實相反，惟有合理批評，使當局不能隱匿，不能反駁，不能自解，於是革命評論便出至十八期宣告夭折了。

革命評論橫死的原因非常之多，第一是專為合理的批評不為當局所喜，已如上述。第二，剛剛出至第二期，便遇着濟南事件，我對黃膺白先生很下了痛切批評。膺白先生少不得芥蒂在心，而使蔣介石先生開始對革命評論厭惡。第三，當日在上海的刊物真是如火如荼，自然這些刊物非革命評論所能左右，然而這些刊物既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自然論調和革命評論有點殊途一致。當日京滬的刊物，除了革命評論和前進之外，還有劉叔模等的『呼聲』，趙惠謨等的『夾攻』；以及章乃器所辦的『新評論』。這些刊物的作者，我都不認識，而他們的論調，却和革命評論相呼應。因此南京一班元老以為我們要在上海造反，吳稚暉先生曾經大聲疾呼，說『人家評論不已，作起呼聲，衝上前去，前進又前進，貫徹他們夾攻環攻的政策，蠻幹得來如火如荼，我才自衛的反抗幾句』。這些元老恐怖的心理，也足以使革命評論非停刊不可。第四，尤其是使南京當局難於忍受的，是我和吳稚暉先生大開筆戰起來。吳稚暉當日以反汪大將自居，自然連帶對我沒有好感。恰值南京又開五中全

會，新聞記者來問我是否出席，我本來已奉命不出席的，因記者來問，祇好答以出席與否，尙未決定。不知道吳先生怕我出席呢，還是借故尋鬧呢，這一段小小在報紙上的談話本來無關宏旨，而吳先生却大光其火，來了一篇長文章。我當時雖然三十以外的人，還脫不了少年盛氣，看見吳先生日日罵汪先生，已經惹動正義感的肝火，這次吳先生竟是找上門了，真是所謂正合孤意，如何願輸。如此一來一往，兩方都寫了三四篇文章，吳先生固然還拿出他的潑辣本領，我也破格回他儻懶口吻。卒之蔣介石先生在報紙發表談話，吳先生也借此下場，而革命評論遂夭折了。第五，還有不可恕的，是我還辦了一個大陸大學，當時的確是一個青年的大本營，叫囂的青年，竟然恭維是黃埔第二。當時大陸大學的處境真是困苦顛連，南京當局的嫉視，共產黨的搗亂，租界巡捕房的尋覓，可謂無日無之，要停大陸大學，不得不先向革命評論動手，這也是革命評論致命原因之一。

革命評論不是無故停版的，在吳陳筆戰之後，一日宋子文先生約我在海格路唐先生處談話，勸我不要再辦革命評論。我知道宋先生是奉命來勸導的，但我答以革命評論可以自存，不能受任何方面的干涉，這一席話談過之後，意外的災禍便紛至沓來。第一件事，上海的書店已受密令不肯替革命評論代銷。其中有些同情革命評論仍然暗中銷售的，便有人指揮馬路上的英雄，用石頭把書店的

玻璃窗擊破。書店代售一本評論，不過只得回扣五分錢，碎了一塊玻璃起碼便丟了幾十元，老板以血本攸關，祇好婉詞不幹。不要緊，書店不肯代賣，還有攤販，可是馬路的英雄，甚至加入了巡捕，發見代售革命評論的攤販，必使他受一頓毒打，如此攤販以性命攸關，也謝絕代售了。第二件事，郵政局受了命令，把寄往外埠的革命評論全都扣起來。有一天市黨部一位黨員來見我，說市黨部的廚子對於我感恩不淺。我不禁愕然一驚，如何我會有恩於那廚子。原來郵政局所扣的革命評論，全都送市黨部，刊物既然無用，廚子遂拿它當柴燒，廚子是包飯的，柴火當然算一種開支，既有了革命評論作了代用品，廚子平空省了一筆柴火費。第三件事，全滬的印刷局也同時接受命令，不許印刷革命評論了，誰印革命評論，誰就有危險。印刷老板是以營利爲目的的，不是以賭命爲目的的，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何況這次是命與利之分，自然舍小利而圖苟全性命了。革命評論處在這個山窮水盡之境，祇好停版，我當時曾在報上登一段停版廣告，現在忘記了原文，大意說：『革命評論宣告於某月某日停版，其理由不願說，不便說，亦不能說，請求鑒原』。

革命評論是停辦了，而革命評論的影響已普及於全國青年。革命評論當時的確聲勢浩大，影響所及，全國騷動，外國記者索可洛斯基 Sokolsky 在字林西報接連登了兩日頭版論文，說革命評論

每期出版五萬份，照中國慣例五個人看一份刊物，已有三十五萬的青年讀者。路透社記者也爲着這事會以長電致倫敦泰晤士報，渲染當日革命評論的聲勢。自然他們的舉動是不一定善意的，僅是一種事實描寫，促起各方面的注意罷了。其實革命評論最多出版三萬五千份，沒有他們描寫那麼聳人聽聞，不過出版的量數，的確爲當日雜誌中之冠。

革命評論是停版了，可是革命青年的情緒是無從遏止的，各方面的革命青年都集中上海，要求一個組織，所以在十七年的冬天，召集各方面的人物，經過三天的討論，遂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這個會的綱領大概根據我所著『今後的國民黨』和『黨的改組原則』兩篇文章。同時我接到汪先生由巴黎給我的電報，希望我往歐洲一行，我遂於十八年一月廿四日自上海動身，以後同志會的事務，都由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朱霽青主持，以後上海成立軍事委員會，和各省市黨部聯合辦事處，都是後來的話，我歸國以後，初則在香港主持兩廣的軍事，繼則北上參加擴大會議，對於所謂改組派，祇是浪得虛名，上海的大計，我很慚愧，我的確沒有負過艱巨的。

我在十八年三月一日抵法國馬賽，汪先生派曾仲鳴先生來接我，告訴我幾件消息，第一，李濟琛先生終於在三大大會前以吳稚暉先生跪請入京，致被囚湯山。第二，吳稚暉先生以營救李濟琛不

獲，當蔣先生面前碰死，武漢方面李宗仁胡宗鐸他們已開過追悼會。第二，南京方面已向武漢進兵，唐生智和張發奎等皆被起用。在歐洲祇有兩個多月，中間曾有一次至倫敦逗留兩星期，和英國將登台的工黨會面，五月八日又在馬賽登船回國。

在香港以主持兩廣軍事，一住便大半年，其間軍事行動有足紀者，張發奎和薛岳在宜昌起師回西南，張桂軍合師攻粵，然而因着內部的矛盾，都告失敗，因此在十九年春又奉汪先生北上和王法勤會晤閻錫山先生，并與謝持、鄒魯、覃振、傅汝霖諸先生見面，終成擴大會議之局。這個局面終於在秋天又瓦解了，那時改組同志會對外的各省市黨部聯合辦事處早已由滬遷至北平，我們全體都赴太原，九月分別由晉移津，這個局面很多可以紀述的事實，我打算將來再另行紀述，留待異日發表。

在擴大會議失敗後，我是在十九年十一月中離津回香港的，同志中自然希望我能留在天津主持刊物，不過當日我的確有些疲勞，而且更有些心灰意冷。第一，改組同志會根本即不健全，自擴大會議開後，無形經已解體，何況當時各方似乎都對改組派同志不滿，以為有了改組派，黨便不能團結。第二，擴大會議的結合，本拉攏而成，北方的政治似乎不是幹的，而是要的，根本和我的性格

不合。第三，我當時的環境頗有實不至而名歸，我是唱慣跨刀的，實在不想挑大軸，我再戀戀於殘餘之局，必至體無完膚。我也不是迴避責任，的確當日無責可負。心想我的學識經驗還是不夠罷，倒不如遠遠找個地方，修心養性，澈底檢討一次中國的前途，和今後的路線。在香港正在候船出國，於二十年一月讀報知道汪先生有解散改組同志會的宣言，我立刻草一個電報交駐港辦事處夏威先生，請他轉電汪先生，贊成這個主張，於是在一月遂放洋出國，計改組同志會成立於十七年冬，解散於二十年春，為期整整兩年，改組派的史略，不過短短如此。

社會上的傳說，改組派不是如火如荼嗎？為什麼不健全呢？那祇有個中人知個中事，現在事已過去，不妨拉雜書之，并趁此表示一些事後感想。

(一) 改組同志會成立的初期，在理論上和事實上經過無數的波折。現在社會祇知道改組派的主要人是顧孟餘先生和我，然而我們兩個人很有許多不相同的地方。我是當時極力主張有組織的，孟餘先生則不大贊成有組織的。終以粵方委員多數贊成，孟餘先生才出而主持。談到理論，在名詞就爭過好幾次。我主張還以社會學的名詞，攻擊共產黨的理論，所以仍用『小資產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術語，而孟餘非改爲『小市民』和『各界』的字樣不可。這麼一來，使得各方面集會的

人，都表示不滿，開始便有分裂的現象。

(二) 改組同志會的委員是什麼人呢？各地來的代表都是資歷不深而地位相當，全都選爲委員罷，會使分配不均，容納一部份罷，又必使各方不滿。討論結果，還以粵方委員爲中堅，而以由各處來的代表，擇要選爲候補委員。這種調停結果，各方都認爲是一種不澈底辦法。而且粵方委員中，何香凝先生首先表示不願參加，今日她的思想怎樣，我不知道，而在當日的表示，她對於改組同志會是同情的，對於蔣介石先生是愛護的，對於共產黨是希望其反省的，對於農工和容共的政策還是贊成的。陳樹人先生是表示加入的，但陳先生有他詩人的風度，對於政治興趣似乎不高，談到政治鬥爭更似無此習慣，終日祇大做其閨人之詩，對於改組同志會似居於賓客的地位。至於甘乃光先生，始終和改組同志做朋友，而不參加任何會議，我們在上海辦刊物，甘先生早赴海外作逍遙遊。這樣粵方委員便所剩不多了，人事之不健全，於此可見，假使當時沒有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指派代表，各地青年也不會反對，各省市黨部聯合辦事處也不會成立，恐怕改組派僅是一種歷史上的名詞，連失敗的機會都沒有。

(三) 改組同志會當時以政策爲對象，而不是以人爲對象，在當日成立時候，還是在汪蔣合作

時期，因此改組同志會對於南京人物始終保持一種沉默靜觀的態度，直至蔣先生北上北平，天津市黨部和北平市黨部沒有歡迎標語，蔣先生認為是改組同志會對他示威，於是在歡迎會上提出改組派大罵，改組派人對於蔣先生的態度才變。其實當日北方黨部都在實踐社和新中會手上，其領導人為蕭忠貞和童貫賢，初與改組派無關。後來第三次全國大會開會，南京堅持一切代表均由指派，而粵方委員則主張選舉，由是改組同志會和南京始立於反對地位。迨至第三次全國大會警告汪先生，停止顧孟餘黨籍一年，及永遠開除我和甘乃光黨籍的決議，同志會才與南京短兵相接。同志會成立之始，還沒有政治鬥爭決心，其後事勢推移，才與南京對立，一切處於被動，是為同志會主觀不健全原因之一。

(四)同志會成立時候，本注意於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和重新改組國民黨，則其注重黨的根本問題可知。無如成立之後，即有軍事行動，軍事是不擇手段的，初則和桂系合作，繼則和馮閻合作，對於黨的組織和訓練，無從提起。黨的改組本為同志會主要目的，後則專談方法，棄其目的，這也是失敗的一種原因。

(五)改組同志會本想網羅各方同志加入，但以交通不便，和秘密關係，很多革命同志事前不

獲預聞。虛矯是中國人的通病，許多人既以事後加入爲恥，於是多獨樹一幟，自命左派，甚至痛詆改組同志，自鳴其高，改組同志會當日若不解散，其流弊必至互相摩擦，非瓦解不止。

此外我最感覺苦惱的就是革命評論的基本份子，這一班先生有兩個大毛病，第一個是文人的通病，容易發脾氣，不是劉侃元和蕭淑宇發生意見，就是許德珩和施存統發生誤會。每有一次意見和誤會，就找我調停。我以爲革命是大衆的事，是自己的事，不需要什麼人恭請的，然而不然，這一班先生們無不以諸葛自居，要劉立德三顧草廬，還要高臥半天吟他『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才起來。我時常笑他們中了三國演義之毒，但我確有些疲勞而不願日日學那冒雪訪賢的把戲了。第二個毛病，尤以施存統先生爲甚，既已『悲痛的自白』，在武漢清黨時脫離共產黨，也有過不少深自懺悔的文章，但說到真以行動來反對共產黨，終不免足將進而趨退，口將言而囁嚅。他這樣舉動，很像後來一般人民陣線的大人物，在共黨之外，而同情共黨，我當時實在覺得與之長此委蛇下去，終無是處，現在回想前塵，還代施先生有身其餘幾之感。

我自從改組同志會解散之後，居於歐洲幾個月，除西班牙外，西歐和中歐的國家，幾乎都足跡殆遍，末後以比利時生活程度稍低，遂卜居於勃勒塞爾郊外，動手寫我的『革命與思想』初稿。大

概初夏罷，偶然在郊外小坐，買了一份倫敦泰晤士報，看見胡漢民先生被扣，安置於南京湯山，不覺感喟默嘆了一聲，以後又知道廣東非常會議成立，然而我依然迄不爲動。至到九月，接了許多國內同志間接來信，才打算起程歸國，舟過哥倫堡，而瀋陽事變起，夜間在舟上甲板望望天涯，吟了一首詩：『海上淒清百感生，頻年擾攘未休兵，獨留肝胆對明月，老去方知厭黨爭』。那時我以國事至此，決心不再辯黨的是非，誰對誰不對了。二十年冬至南京，以至二十六年，我始終站於黨爭以外，什麼CC，什麼革新社，我都認爲沒有意義，而是小孩子吵鬧的小事。至於二十七年夏天在漢口，當時各方面似乎有些覺悟，陳立夫和陳誠兩位先生到我所住的德明飯店談話，希望黨的統一，陳誠先生曾說『以往黨的糾紛，應該由我們三人負責』。我笑說：『民國二十一年以前，我可以說完全由我負責，二十一年以後，我可以說完全我不負責』。立夫先生也說：『近年黨的糾紛，公博先生的確沒有責任』。我在改組以後，我有一個信念，以爲黨若是弄不好，國家隨着沒有辦法。特別委員會，我認爲破壞法統，所以我反對。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指派代表，我認爲破壞黨紀，所以我反對。然而不料這種正義感倒引起數年的滔天大禍，現在回憶起來，確有些何苦如此之感。

改組派的史實就是如此，不過雖然短短兩年，却做過了許多驚天動地的事，爲功爲罪，我不願

加以批評，深願有日有人能夠多找些文獻，再編一本紀實，亦使『後之讀者，亦將有感斯文』。

民國三十三年稿

補記丁未一件事

小序

我爲着這一篇『補記』，心內真是非常躊躇，不但是躊躇，而且經過長期間的躊躇。好像我不寫這一篇補記，在我一生中還有一件重大未了之事，寫這篇補記罷，又反乎我父親的志願，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是古人給予我們的教訓！古人所謂三年無改，意思是最好永遠不改，若要改時，最少也得三年。這篇補記原在可寫可不寫之列，所以我便躊躇起來了。

辛亥以前，我在香港報館工作，從來沒有對人談過丁未那件事，也沒有在報紙上寫過丁未那件事。辛亥以後，父親出了監獄，他素來不以老革命黨自居，從來沒有對人談過丁未那件事，也沒有叫我記載過那件事。在辛亥以前，我若向人談及，總覺得有點乞憐，乞憐我是不爲的。在辛亥以後，父親更不向人談及，以爲一涉往事，不免言功，言功是父親所不屑的。我還記得在

民國元年，中央政府組織一個稽勳局，乳源的傅先生，連縣的彭先生，曾向父親提議過，要向稽勳局陳述過去的功績，父親笑笑說：『論及丁未那件事，我不但無功可言，且有罪可議。丁未那次如果可以言功，那麼這次辛亥革命諸人怎樣去獎賞，如果我坐過四年牢就可以算功，那麼死難諸人又何以去酬庸』。這一番話，說得傅彭一班先生們無詞以對，我是記得清清楚楚的。父親既抱不言功的志願，我真不好把這一番事蹟去渲染。

爲着父親的志願，我既不能對於往事妄事鋪張，而且一個人子補述父親的一角生平，實在不容易下筆。譽墓之文是人人會作的，而且很容易作的，獨至平鋪直敘寫實之文，就難於動手。父親早於民元逝世了，他又抱有不肯言功的心事，寫得燦爛，是違親之志，寫得平淡，又有失實之嫌。

並且我自己更有一個性格，我最怕人譏諷爲『潘岳文采，始述家風。陸機詞賦，先陳世德』，後生頂着先人餘蔭來驕其儕輩，我是認爲有玷門楣，如果更藉着先人的功業來獵取地位，那更是自甘菲薄。同時我的見解也正和父親相同，我們做一件事，祇問其應爲與不應爲，不應計算成敗利鈍，敗固不能謂之犧牲，成亦不能算爲功績。父親既不願說，我又何必再言。

然而丁未一件事是一件事，又是我始終其事的一件事，我若不記，則天壤間似乎缺少了一頁史實。我若不補記，則以後更會湮沒不聞，我不願誇張說是『丁未之役』來聳人聽聞，我祇書爲『丁未一件事』以紀往迹，我想這樣平實直陳，大約總可以毋違親志罷。

我躊躇許久，終於執筆了，我極力的搜索已經模糊的記憶，更極力的避免誇張的描寫。可是因爲上述的關係，下筆時未免過於矜持，使得當時如火如荼的一時事實，倒爲矜持之態所掩，這是不能自諱的。

我祇是補記事實，不是渲染功勳，平淡就讓它平淡罷，祇求實實在在的補記便算了。還有些事實已見於『少年時代的迴憶』，爲着避免複述，很多應記的也從略了。

×
×
×
×
×

雖然這篇記載名爲補記丁未一件事，實在起源却在丙午的春天，父親和我爲什麼有這一次的行役，我想既然要補述，還是從頭說起罷。

記得庚子年某一天早上，時候是七時至八時左右，我剛從床上起來，預備上學，食了一碗白粥

和兩條油條，母親正給我打辮子，忽然轟然一聲，屋內微微震撼一下，那時整條我們所住的衛邊街都騷動了。有些鄰居說是地震，有些鄰居說是地雷，更有些鄰居說東門外的火藥局失事，這一陣騷動不久便寧息了，我也挾着書包上學，那年我正是九歲。

午間歸來吃午飯，父親在食飯時候告訴我是撫台衙門後園的炸藥爆發，自然父親不只是告訴我一個人，小孩子是不懂事的，告訴我也沒有用處，不過父親最好發牢騷，對着朋友發牢騷還不夠，無論午飯夜飯，在桌上總得對母親，姊姊和我，大發傷時憂國的論調，很像我們幾個人是羣衆，而他是一位演說家。那個埋藏炸藥的地洞是他親眼看過的，而撫署崩場的後牆也是他親眼看過的，那早他的結論是，照這樣外侮紛乘，朝政不修，以後這類事還正多着，並且感嘆一聲，可惜擊之不中。

沒有多久，這次炸案是破獲了，主謀的是史堅如，史先生是被斬了。史先生被殺，父親沒有去看，祇聽聞許多關於史先生的謠言，有一次我正放學回家，聽見父親和一個朋友正在書房辯論着。那位朋友說史堅如的死是可惜的，但是他生有死相，因爲他是一個白面書生，皮膚很白，但自頸以下，皮膚全是黑色，所以命裏註定要斬首。父親大怒說這完全是廢話，是謠言，史先生死得轟轟烈烈

烈，我們不應在他死後還來這樣無稽的污蔑。

撫署的炸案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見爆炸聲，小心弦震動了一下，種下了以後革命的思想。但同時很奇怪，爲什麼父親對於那位史先生寄予特別的同情，以後對於父親的言論和行動，我的小心兒免不了加了特別注意。父親那時對於西太后特別反對，對於李鴻章也特別反對。他對西太后發生惡感自然是中於一般輿論，說她在國步艱難時，不應大興土木建築頤和園，並且說歷朝之亡都在婦人，唐代的武則天就是一個顯例，西太后實在罪浮於武則天。至於他深惡李鴻章，則以爲凡是外交都派了李鴻章，而外國人也特別喜歡李鴻章，凡是外國人所喜歡的人，必不利於中國。父親這種理解實是當時社會最普遍的理解，在當時的普遍傳說，今日迴想起來，實在也太淺薄，然而也不能說全不合理。

父親當時的朋友，最普通是一般武官，以後慢慢便疎遠起來，而和一般所謂新人深相結納，內中特別要好的要算乳源的秀才傅佐高。傅先生是一位秀才而信奉基督教的，父親和基督教是柄鑿不相入，而與傅先生却是深交，傅先生從來不和父親談教義，專和他談世界的大勢。我那時知識初開，求知心切，從兩個人的談論中，知道些世界的粗淺知識，知道外國的海陸軍，更知道中國不過

佔世界地圖的一部份，而尤其奇怪的知道中國皇帝是外國人，這一點最使小孩子不能服氣，而且去讀朱洪武演義，因為佩服朱洪武能夠把外國皇帝趕走而自己做皇帝。

恰巧教書的先生梁雪濤自命是康梁的傳人，那時清議報似乎已出版了，那位梁先生在講解經義和歷史時候，不時說說康梁故事，尤其最喜歡講的是『戊戌政變記』。我對康南海沒有什麼印象，但對於戊戌政變不成，而至有義和團之役有深切的影響。總以為戊戌事件和庚子事件有不可分的關係，如果戊戌事成，則庚子之難不作，因此也痛恨起西太后，而同情光緒皇，但想想中國的皇帝是外國人，心內又發生莫名其妙的矛盾，總有些茫然不知所措，這一個謎直至兩年後才得到相當解決。

這樣父親一直罵西太后，梁先生一直宣傳康梁，我一直讀書，倏忽又過了兩年，在癸卯那一年的十一月左右罷，父親神態有些緊張了，我的母親是一個善良的太太，老守着內言不出於閫的，到那時也有些異樣了。我記得那時我的家住在大北門內的長泰里，是相當冷靜的地方，那條長泰里雖然號稱為里，却是一條大街，可是對面是一家公館的外牆，那條里祇一面是屋，來往的行人平時就不見得熱鬧。十二月初旬，便有一箱箱的東西搬進屋內，父親指揮着家人，有些木箱放在床下，有些木箱放在儲物的空房。從我父親的口氣聽出，那些箱內都是罐頭食物，有些是罐頭牛肉，有些是

罐頭餅乾。到了臘月，送禮物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情，何況十二月十一日是我母親的生辰，但爲什麼這樣多呢？而送來的都是牛肉和餅乾呢？我一方面在懷疑，而一方面也不敢問，有時偶然開口，父親總是疾言厲聲禁止不許談。我最認爲神祕的是擱在床下那些箱子，既和牛肉的裝箱不同，也和餅乾的箱子有異，一次我偷偷打開看全是很新的剪刀。那時傅先生來的次數更多了，有時深夜一個人來，有時帶着兩三個人來，我心內已知道有事，然而還是始終不敢過問。

臘月將盡，我也解館了，閒的時候多，在家的時候也多，父親和母親雖然不大談政治，但那時已似有重大的事要發生，並且議論着過年是不是往香港。有一天夜裏我在書房看書，聽見父親和傅先生正計議着軍事。傅先生似乎談論着四鄉要來許多人，而父親則注意於那班人是否能服從和統率。我心裏有些明白，雖然不知道內容，可是知道父親並不會出來帶兵，更不會做官，因爲那時父親已不大和官場人來往，總督衙門也有半年多沒有去，這樣統率許多人要作什麼呢？真成了一個疑問。有一天我忍不住偷偷去問鄧錫英，鄧錫英是行伍出身，跟了父親許多年，並且積功保到了千總，我們習慣稱呼他老鄧，他在家內是以中軍自居的，那時的中軍就是今日所謂副官長。他不用說話而以苦笑答覆我：『好少爺不要管罷，軍門要造反了』。他那時的情緒，到底是贊成，還是反

對，我不敢說，但使他縱然不贊成，也絕不會反對父親，那我可信判斷不誤的。

新年越發近了，從各方面的推測，雖然父親始終不和我說明，我已知道黨人要在事成之後推我父親做軍事領袖。大約我父親對於這事是沒有異詞，但他到底是軍人，他所憂慮的，發動的人未必能聽他指揮和支配。這次造反母親應當知道的，最少也應知道大概，爲着兒女安全，是否暫時離開廣州是一個問題。她雖然不大迷信，拜神求佛一年之中也會上幾次廟的，她自己沒有把握在得了父親允許，便到蓮花井關帝廟去求籤。那一紙籤文到底是第幾籤，我全忘記了，祇記得頭一句是『北山門下好安居』，父親便說那不必搬家了，長泰里是在大北門內，那不是北山門下好安居嗎？這樣一紙籤文的決定，我們便沒有搬家的企圖。在父親的判斷，以爲一定事成，而家也沒有危險，焉知道後來失敗，而家倒沒有被拖累呢。我不憚詳寫這一段經過，並非提倡迷信，實在因爲當日的印象太深而事又太巧了。少年剛在十二歲，而有這樣重大的事，使我終身不忘，不但當日的情形還在目前，連那無關宏旨的籤文首句也都記得。

我又知道，起事是在大除夕，廣州的習慣，每年除夕大家都買些牡丹，水仙，吊鐘花來陳設過年，雙門底是一個臨時花市，那就是上海的南京路，那夜買賣是做到天亮的，雙門底今日變了永漢

路，每年在大年夜時直是人山人海，萬頭攢動，可以說是除夕元宵兼而有之，我每年除夕都跟着家人去買花，趁熱鬧，但父親已預先關照，那年除夕不許我們小孩子出門，尤其不許至雙門底。

我慢慢又知道他們起事的方法了，他們乘亂闖閨時候，拿剪刀先把人家的辮髮剪去，這種舉動表示着革命的符號，並且被剪的人縱不是同黨也得裹從。那些木箱擱在床下的都是剪刀，而在儲物房中的牛肉餅干是起義時，恐怕戰役延長，拿來作糧食的。我心裏想是不是水滸傳內的大名城，心中祇是盼新年的來臨，也沒有感覺危險，更沒有什麼恐懼。

在起事前的第二天，在一個下午將近黃昏時候，傅先生帶着灰白的臉色跑來，說事情已經敗露了，已經有幾個人被官兵抓去了。保護沙面（那是廣州的英法租界）而駐紮在西橋的楊副將已被命往芳村教堂起獲軍火和其他軍用品了。傅先生的報告，還是我事後知道的，至於他和父親如何計議，我當時是絕不知悉的，祇知道在傅先生走後，父親督着家人把十幾箱剪刀推落在後院的井中，至於餅干和牛肉就封儲物的房內，此外還有幾箱的外國天鵝絨便帽，廣東喚做喼帽的，也原封不動，放在儲物室。我還記得，母親帶着懷疑的眼光問父親：『這樣你以為便穩當了嗎？』父親笑笑說：『我以為也將就了，憑我這塊提督頭銜，諒他們也不敢搜我家。倘若真來，那只有聽天由命』。

這次流產的革命行動便這樣終結，我當時祇知道拿去的人都砍了頭，傅先生跑去了香港，社會上也不大傳說，報紙則祇有羊城日報和廣雅日報也沒有詳細記載，我的家更沒有人來過問，可以說是七粵無驚。到了大除夕，雙門底還是人山人海，我和鄧錫英在人山人海中擠去擠回十幾次，過了十二點鐘才回家，父親早於九時便睡去，我也在除夕的萬家鞭炮中蒙頭大睡，這是一次的經過。

這樣無話即短的又過了幾年，父親對於我已不諱莫如深，而且知道我對於那年除夕的事都清楚，更不對我隱祕。他和北江會黨與舊日部下通訊也交我處理，至此我才知父親的舊部是由廣西帶回來，而復員在連山英德清遠一帶，又知道父親早和會黨有關。這些散兵是和會黨有不可分的關係的，正所謂聚則爲官兵，散則爲會黨，那年傅先生之所以介紹父親和香港黨人合作，就因爲有那一種的關係。

丙午的春天到來了，傅先生早因風聲鬆懈，又來往於廣州香港間，大約他們認爲在廣州起事沒有多大希望，變計要從東江和北江起事。廣東的東江是惠州，潮州，嘉應州一帶，北江是韓韶州，南雄，連州一帶，父親所擔任的起義地點是北江。我父親擔負北江軍事的原因，其一是舊部散處各方，容易召集，其二是祖居原在乳源，總有些子弟兵的憑藉，其三是北江北通湖南，西連江西，進

退可以自如，因此父親便認定北江是一個極好的起事地點。

這次計劃是經過兩三個月時期考慮的，我父親在兩三個月內就來往香港好幾次，大概供給軍械是香港，召集舊部是父親，運輸軍械是傅先生，而起義地點是在樂昌縣的坪石附近。對於軍事，在湖南的宜章取守勢，以湖南的會黨擾亂湖南，以牽制湖南之兵，由坪石直下樂昌，再分一枝軍由英德上溯，以奪取韶關爲目的。等到取得韶關以後，率兵直下清遠，以待東江之師。這一次的計劃，也可以說是會師廣州，至於擔任東江軍事是什麼人，我是不知道的。

舊曆的四月，廣州已是炎夏了，有兩個姓陳的會黨由北江來迎我父親，這也是預先約好的。這樣在四月十七日父親帶着我和鄧錫英，偕同兩個會黨僱了一艘河西船由廣州溯江北上。那時粵漢鐵路還沒有通至韶關，父親主張附船的理由，說便於沿途一觀形勢，而且在途上還可以和會黨接洽。這條水路現在恐怕沒有人走了，有了火車，誰也不願走這樣遼遠的水程，這次水路由廣州經過所謂天下四大鎮的佛山，三水，蘆包，清遠，英德，而達韶州，路上沿途耽擱而又碰上北江發水，足足走了十五天才到達。

一日將近黃昏，船到了琶江口，父親便命船家停船，那船家說那個地方是有名的土匪出沒之

區，萬萬不能停。父親說你們怕嗎，劫了船我賠你們便了，船家沒有辦法祇好停下來。暮色四合，我們剛在夜飯，遠遠便看見無數火把向着江口來，船家跑進艙內報告，那是強盜來劫船，我看了船家的臉色，也不禁有些凜然。那兩個姓陳的會黨說他們是來接父親的，站在船頭大聲招呼着。火光下出現了幾個首領來請父親下船，父親到了岸上，慰勞了幾句話，並說到村內不便，而且後會有期，那些人更送來兩罇酒，四條火腿，說是送我們船上作路菜。父親回到了船中，火把還堆着不散。父親很奇怪，問那兩個姓陳的，他們爲什麼留在岸上，那兩個姓陳的遲疑一下，遙着對江兩條船說：『大概他們要打那兩條船的主意罷』！父親那時似乎有些怒意，說：『今天我在此地，斷不許他們胡爲』。那兩個姓陳的在船頭打了一個招呼，我也不知他們說什麼，那一大堆火把一下便散開，在黑暗中很快的便消失了。我們船上的船家，那時已恢復人色，幫着搬酒和火腿，那夜便這樣安然渡過了。

我們在韶關停泊在西河，父親上岸拜了一次客，那是他的舊同僚南韶連總兵雷鎮毅，他在下午也照例回了拜，翌日換船往樂昌，由樂昌換船到坪石，我們在離坪石之前半天，便上船換馬到遼水鄉，這一段行程就這樣完畢，而船則愈換愈小，路愈行愈難了。

我們在廣州出發的是河西船，所謂河西船就是韶關河西的船，在中艙起立是要低頭，但還可以坐在椅上。由韶關至樂昌，船是比河西船具體而微，固然不能起立，也無法可以放椅。由樂昌至坪石簡直是小艇，坐臥食均在船艙的木板，連抬頭都似有些費事了。這條水道是有名的十三瀧險灘，江中時見大石，勢如伏虎，兩壁都是懸崖，而江流湍急，又似奔馬。我尤其感覺奇怪的，船由樂昌開行不到半日，船夫都脫得一絲不掛在搖船。我真奇怪到要叫出來，我父親望着我說，你覺得奇怪罷，等一會你便明白了。我自念也許這是一種風俗，也許是少見多怪，看見一個個赤條條的船夫，很似糊塗塗到了小說上的菲洲。

不一會我真明白了。原來這條江淺得水清見底，但因奔流太急，更沒有一條游魚，到了水不可沒膝而又奔湍時，船夫無法更搖船，祇得赤着身下水，把船扛起送上灘去。搖船，撐船，牽船，我在珠江都見過的，在書上也可見到的，獨至扛船還是頭一次初開眼界。船夫着了褲扛船，容易被水沖刷，所以索性一絲不掛，來作『浪裏白條』。我問父親，怪不得船夫都是男人，沒有女船家，恐怕就是覺得不雅罷，父親笑笑指着對面搖來的船，說：『那對面來船，搖船的不是女人嗎？見慣不驚，祇是你見識太少罷了。何止船家有女人，就是搭客有女人也無可奈何。我還記得曾國荃調任兩

廣總督時候，就攜帶女眷由此道南下。當時他看到這種情形，大怒說船夫侮辱官眷，要送他們到樂昌縣各責一百板，後來經人說明，也就釋然，每個船夫還賞給一百文制錢買一條薄布遮蔽下體。不過這一塊薄布又能遮多少呢？還不是一個樣子罷了。父親又繼着笑笑，『這個例子又被曾國荃弄成了，以後凡有女眷附船，都要每人賞給一百文，否則船夫還要做出許多怪狀呢！』

我們最終是到了目的地了，來接的有三十餘人，備了五匹馬，這是我們到了韶關以後派人從陸路去送信的。來接的人還攜帶武器，但我一看都是粉槍，毛瑟僅有兩枝，這使我不由得心內猶疑起來，用這些槍枝來起事，在我看是似乎太兒戲，但想到傅先生在廣州說過，香港當陸續運來快槍，心內重又興奮起來，那起岸的地名喚做官埠，是在坪石之南，我們住居的地方名喚方塘，離官埠約有四十里，沿路都是巒山起伏，亂林雜生。方塘的形勢相當險要，處於萬山叢中，周圍平原三四十里，下臨一條河喚做遼水，這是那地名爲什麼喚做遼水鄉的由來，當前一座山喚做石子嶺，控制下河的要道有一座龍王廟，我們便權借這廟作發號施令的機關。大約事前他們都有相當準備，廟的司祝也是會黨中人，方塘還有兩個監生，算是地方紳士，還趕來招待我們，以後更在村內找一所房子，作爲我們的寓所。

父親告訴我，方塘原來是我們舊日的故鄉。故鄉總有田園廬墓的，可是田園廬墓早就破的破，賣的賣，祇賸下遠祖的墳墓，這因為祖父早就離鄉遷廣州，父親一生回鄉也不過幾次。父親雖然很少到北江，他在廣西提督任內的官兵倒有很多在故鄉招募，父親這次先要回乳源，無疑的想拿子弟兵做基幹了。

我們到了方塘不久，便計劃着如何招募士兵。我們是不能公開募兵的，父親的打算一面召集舊部，一面聯絡會黨。廣東沒有所謂青紅幫，獨有的是三合會，或名爲三點會。廣東的三合會很普遍，不止蔓佈於廣東，而且勢力及於湖南和贛南兩地。父親以爲光是聯絡三合會還不夠，必須擴大三合會的組織。這可使我苦了，三合會也有一種會章和隱語，父親要我謄寫二百本，分發各地的小單位。起初我寫的很快，一天可以寫三四本，末後便一天慢似一天，因爲我除了寫三合會的章程以外，還要掌理文書，而且那種章程和隱語都俚俗不堪，起初鈔時感覺有些興味，末後越寫越覺粗野，竟不想下筆了。我發出一個奇想，向父親條陳，應該把它修正，易爲文雅之詞。我父親堅持不可，說這是數百年傳下來的古規，而且那章程和隱語都普遍了，不祇不能修正爲文詞，甚至連一個字都不能更易，否則失了作用和效力。這樣的司書工作我直埋頭幹了兩個多月，天氣悶熱，夜裏點

着土油燈在抄謄，村內識字的人不多，父親更不信任他人，只責成我獨負其責。

我謄寫這些三合會章程是隨寫隨發的，乳源大致分爲上山和下山，下山是接近縣城，是通韶關的大道，而上山則接近湖南，過境便是宜章。我們到了沒有兩個月，上山加入三合會的已很普遍了。但光是擴張三合會有什麼用？父親當時也想出宣傳和訓練兩種辦法，當時所謂宣傳，就是在三合會開會時間，備述自甲午以來中國對外的失敗，而結論也很簡單，中國之所以打敗仗，一半原因是西太后負責，而最大原因就是中國皇帝不是中國人。往往在結論時，父親說：『祇有中國人做中國皇帝就會打勝仗了』，鄉下人也有些聰明的，問父親誰可以作皇帝呢？父親實在難以解答，祇有說到了那時自然你們所盼望的真命天子會出現的。而訓練方法呢，三合會本來是有規則的，最重要的集合就是拜山，不過拜山是在夜間，父親以爲應該改爲白天，每次拜山聚了一大羣人，父親更說拜山要壯山容，會員有快槍的應當拿快槍，沒有快槍的，就是標槍，粉槍，甚至舊兵器的大刀，三叉也要拿出來，這樣才顯得聲勢。父親這樣主張，無非想檢查會員的武器，看看有幾枝快槍，將來可以集中應用。乳源上山每逢一鄉村拜山都請我們參加，我一面跟着父親跑，一面夜裏謄章程，的確非常費力。這樣拜山由乳源一直轉至湖南的郴州，又拜至江西的贛州，直把粵北，湘南，贛南，

圈在三合會的圈子裏。

那時我感覺愉快的有一件事，而感覺困苦的又有一件事。所謂愉快的就是馬術進步，本來我在十一歲就頑皮不堪，又看到小說上馳馬試劍的故事，更躍躍欲試。父親對我騎馬是不許可的，是否『丈夫亦愛少子乎』的心事，我不知道，可是從沒有明白允許過。我祇好和馬伕商量，在大校場放草時，偷偷去試馬。放草的馬不但沒有鞍鐙，而且沒有籠頭，這樣每早在校場跑跑無鞍的馬四五遍才上學，心裏沒有一次痛快過。現在好了，無論在粵，在湘，在贛，代步的除了轎子就是馬，這時我可以公然的騎馬，跑馬，非常得意，馬術一天一天的進步，並且可以騎着馬躍過七八尺的溪澗。有一次跳過了溪澗，忽然想起三國演義上的『劉皇叔躍馬過檀溪』，心內不由得心花怒放，在馬上顧盼自如，彷彿自己就是劉備。然而最感困苦的，是語言問題，在北江一帶大概十分之八九是講客話，湖南和江西全講所謂官話，有時父親無暇見許多賓客，要我代表，一時要講客話，一時又要講官話，我感覺非常困苦。語言教師是沒有的，祇好留心私自練習，言詞既然不能達意，而年歲又輕，當時偏促之態，自己也感覺奇窘，所以父親叫我每次見客，我都感到頭痛。

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那時我雖然是十五歲，頭內已充滿了社會問題，第一個問題最使我感覺興

趣的，是廣東和湖南交界的徑口，那個地方祇離我住的龍王廟四十里，時常騎着馬去游玩。湘粵交界祇隔一條小河，那邊說的是客話，這邊說的是官話，不獨語言不同，而且婦女的服裝也大異。廣東婦女把髻盤於頭頂，而湖南婦女把髻拖於腦後。廣東婦女衣長過膝，而湖南婦女則衣短齊腰。如果這條河是很寬廣的，還可以說因為老死不相往來，偏是那條河窄得祇有兩三丈寬，不祇居民時相往來，每早兩岸的婦女還夾着河洗滌衣服。他們爲什麼不同化呢？這是一個問題。因此我懷疑到中國的民族是雜居的民族，除了皮膚頭髮顏色相同之外，並不是歷史所傳說的，中國民族都是黃帝的一脈子孫。

第二個問題是：廣州婦女的貞操觀念特別強固，這是大家所知道的，而廣東北部的婦女，對於這個觀念却沒有幾個人注意，婦女離婚和再婚社會上直認爲一件最普通的事。尤其使我感覺奇怪的，要娶一位小姐，當時聘金的時價是八十元，若要娶一位再婚的婦人，倒要一百二十元，我問他們的理由，他們答覆倒很乾脆，因爲小姐不懂事，娶回去後還要經過長期的教導才會下廚煮飯和上山砍柴，若再婚的婦人，娶回去祇有兩天便可以下田工作，而且這兩天停工僅是一種禮節，並不是呆板的習慣，因此我又想到婦女的貞操大概是從男人的要求來的，而男人的要求多半拿經濟觀念來

決定他的條件。由這一點推想，後來種下了我研究經濟學的原因，更植下我的『除責任以外無道德，除經濟以外無政治』的結論。

第三個問題，是在江西發見的，客家的語言，說他是廣州話不像，說他是官話也不像，而在江西南部全都操着一半粵音，一半官話的方言，因此我懷疑客家是另外一個民族分布於廣東福建江西，而不是普通考據所說是由中州遷粵的。這個問題，後來在民國二十六年在南京的『朝報』打過一場十多天的筆墨官司，直至今日，我還堅持我的成見。現在可惜這篇文章的稿子遺失了，不然倒可以作研究中國民族的參考資料。

各事稍定。我們專等香港的快槍了，父親也曾來過一次大檢閱，集合會黨在石子嶺觀兵，那天是八月初旬，天氣晴朗，清風和煦，這一次與會的黨徒，我忘記有多少人，祇見得從石子嶺頂排起，一直排下過遼水，真是刀槍耀目，旌旗蔽空，父親在山上，坐着一張行軍椅，而我則跟着旁邊，少年好事，在這種熱鬧的場面，自然興高彩烈。可是父親絕對沒有露出半點得意的顏色，反而一似重有憂者。夜裏父親在草場乘涼，我在旁邊看微月，父親問我今天的情形感覺怎樣，我白天看見父親的態度，簡直不敢回答。父親嘆口氣，低聲說：『如果香港再沒有軍械運來，這個局面是要失敗』

的』。他更說：『看今天人數雖多，我看快槍還不到十枝，韶州的巡防營全都換了快槍，這可以斷定很難成功的』。

我們又等了許久，不特香港的槍枝杳無消息，連給養都發生問題了。父親派人回廣州，把在佛山鎮所開的兩家綢緞莊都頂給了人，在廣州的屋子也賣了兩座，但是所得有限，不一會也完了，聚集了許多亡命之徒，得不到給養，大有人自爲政就地籌餉之勢。傅先生派人來說，因爲香港款也有限，以運輸之便，新式槍枝先運東江，看來香港的人們已有側重東江，而輕視北江的傾向。我們真是急極了。據父親的判斷，不外兩途，一則香港實在沒有槍枝，所以拿先運槍枝到東江來搪塞，二則或者真是以交通方便之故，先運槍枝至東江。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目前所最憂者爲財政問題，香港不祇沒有槍運來，連答應所籌的款也分文不匯。韶關本來有一個交通站的，父親催得急的時候，索性溜回香港，這麼一來，我們很像上了俗語的半天吊。

北江因爲聚了許多人，平日大約打家劫舍慣的，而且根本不知什麼是紀律。三合會的會規祇是會內的約束，似乎對於會員對外是取放任主義，我們所得報告，到處我們的人已發現抽收殷富捐和田畝捐的事了。父親也會因此大發雷霆，革除了許多頭目，但人要吃飯是事實，我們沒有錢給他們

也是事實，嚴懲祇管嚴懲，而騷擾也在騷擾。久而久之，剷除貪官污吏的口號也普遍了，本來這個口號是預備起事時用的，因為反對皇帝是鄉下人所不能了解的，正是山高皇帝遠，皇帝的好壞，他們不知，而官吏的良否倒是他們切膚之痛。可是預備起事時的口號，提前應用，而且在實行了，在不遠的礦山，沒有官而祇有兵，結果我們的人把兩名礦兵殺了，乳源派來的委員調查，也細起來了。在前清末年，雖然是朝政不綱，一件人命案子社會上視為很嚴重一件事，何況殺的是兵，而細的又是委員，乳源縣長那時是一個姓程的，於是飛呈向省裏告急，兩廣總督張人駿遂電告清廷，以父親『嘯聚莠民，圖謀不軌』革去頭品頂戴，題奏提督，褫去黃馬褂，清廷覆准，電達南韶連總兵雷鎮毅派統領朱福全帶新兵四營，向乳源進剿。我們在廣州和韶州是有坐探的，至時傅先生派人趕來乳源，報告這些消息，至於乳源的情形，父親陸續有報告到香港，然而香港方面到了那時倒一無主見，傳來的命令，要父親自行選擇兩途，一是立即解散，以謀後圖，一是馬上舉兵，以失敗為宣傳，父親那時知道要靠香港應援是沒有希望了，他一面派人到英德調人進攻韶州，以牽制剿乳之師，一面派了兩三百人堵住坪石和官埠，以防朱福全水陸並進。

這樣又過了五六天，香港沒有消息，而英德和清遠也沒有消息，湖南郴州方面的三合會是和廣

東的三合會不大合作的，說起兵一時來不及，最好父親放棄乳源上山退湖南。父親一夜在大沙坪召集底下的幹部，開會決定攻守或解散之策。我記得那夜月色是迷濛不明，坪上點了無數火炬，還殺了一條牛五六隻豬，幾百人圍在地下喝酒和計議。人聲相當的鼎沸，全村的狗吠起來，鄰村的狗也聞聲相應。幹部的人物有退伍的軍官，有會黨的頭目，有村內教書的學究，有教拳脚的教頭，聚議結果，有一半主張撤退往湖南，有一半主守以待東江響應。主張最激烈的要算一個教拳脚的譚名喚做拗頭羊，他的頸項是歪的，而面孔有點像羊，所以名喚拗頭羊，他大聲疾呼，說他懂得神打，所謂神打，就是刀槍不能傷害身體，他願意領他手下幾十個徒弟，去迎擊官軍。這一場會議，算是沒有結果，因為父親祇是聽取他們的意見，並不是採取決議的方式。及至會散時候，已是零露滿天，鳴雞四野，父親帶我回到龍王廟，對我很嚴肅的說：『我看這次又要失敗了，香港既然沒有辦法，東江又無消息，我還是喚鄧錫英先送你回廣州罷』。我說：『這樣我們就走了嗎，但父親不走，我是決不願獨去的』。『你真是傻子，我要走是隨時隨地都可以走的，但帶了你，兩個人都不方便，我要你到香港找着傅先生告訴他們一切情形，俟你走後我即往湖南，湖南隨時都可以作後圖，祇要把這個嚴重時期捱過了，以後都可以起義』。父親那時再不容我置詞，馬上喚老鄧備了一匹馬，說

要走就在此時，我應立刻要準備。

我抱着疑慮和憂鬱的心情，天才微明，便乘了馬往官埠出發，我對父親一半是信任，一半是憂慮，父親平常對我說話從沒有騙過我，並且沒有騙過人，他說要往湖南，我絕對相信的。但既然往湖南，何以不讓我同去，而且父親身邊真缺乏一個親信人，我和老鄧走了，更有什麼人服侍他呢？我把包裹打好之後，更死心不息說：『父親能不能讓我一同到湖南，我恐怕父親身邊沒有人照料』。那時父親倏然露出怫然之色，那是我平日很少見到的，說：『你還是小孩子，不懂事，難道我看的事比你還差嗎？立刻動身，不必多說』。父親既是那樣決定，我還那裏可以開口，祇得快快上了馬，和老鄧出發到官埠。自此我沒法更得父親的消息，直至我到了香港，然後才知以後一段父親壯烈的故事。

我和老鄧起程是在天還未明，馬蹄踏着山石，從亂草雜樹中向官埠出發，行程不過四十里，中飯前早抵河邊了。我們還是走來時的路，官埠的小船也有十幾條，都是我們常川僱定的，我和老鄧坐了一條船，而將那匹馬另外載在一條船，官埠本來有我們的人二三百人，他們祇知我們到樂昌，至於父親怎樣計劃還不知道。由樂昌上水要兩天才到官埠，而下水不到一天便抵樂昌城外了，我們

不敢堂而皇之僱船下韶州，還是騎了那匹黃馬沿着江邊走，這是老鄧的獻議，並且說父親是那樣吩咐的，由樂昌至韶州，道路比較平坦，祇走兩天便到了，誰知剛要過河到韶州，我們忽然被汎兵截留，還有一個姓陳的千總說我們是會黨，將我們的行李全行搜檢，自然所謂違禁品是搜查不出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帶，那位千總末後把馬留下，算是他的戰利品，猶幸老鄧身上還有二十元現洋，我們草草找一家小旅館宿了一夜，翌日便起陸到英德。

由英德至廣州還有一段很遠的路，還是老鄧出的主意，我們可以附木排。提起這個木排，恐怕我們的朋友都沒有試過。英德本來出產木材，商人爲節省運費起見，把杉木用纜編捆成排，順流而下，木排上安放幾塊板，在板上搭上兩三塊竹蓬，這是駛排人安宿之所。我們附了這個木排，每人祇花六元錢，食宿船費都由船家包辦。他們駛排的方法也很簡單，祇在排前排後，安上一條木，可以當槳，可以當舵，我上了這個木排，又似另換一番新的世界。木排夜裏有時趁着月亮也行駛的，但多數在夜間停泊在江邊的荒村，趁着空閑，沾些酒食。一夜木排已抵清遠峽，夜裏無法成寐，心懸念着父親，更掛念着老母，看了一彎斜月，幾點疎星，心內感着無窮的悲憤，默默的成了一首詩：

『匹馬渡韶水，寒風吹峽門。疎星點浮石，殘月照孤村。奔命窮投止，餘生恥苟存。

十年須記取，橫劍躍中原。』

這一首詩，自然是寄一腔之孤憤，但後來我想這是少年誇大之言，所以我沒有將它收入『我的詩』。

廣州畢竟抵達了，我懷着滿腹憂疑，如何把這一段事報告母親，但抵家之後感覺很奇怪，母親倒反而安慰我，因為父親在我走後，更派了一個名喚打虎將寶雲的追蹤到廣州，他喚爲打虎將，因爲他和一羣獵戶打過虎，左臉和右肩曾受虎爪所傷。他是從官埠附船至樂昌，在樂昌換船至韶州，又由韶州附船至三水，再換火車至廣州，他雖然後我一日而行，但比我先到廣州兩日，母親已經知道大概了，並且還示我父親一封信，最沉痛的有兩句，說：『與其駢死斬嗣，毋寧倖存再圖』。但寶雲也不知道父親到底是到湖南，抑或率領子弟抵抗，不過他帶來父親的口訊，要我送母親到香港暫住幾時，我想那也是必要的，翌日便奉母親到香港，留下老鄧和寶雲在廣州等消息。

我雖然生長在廣州，對於香港我祇去過兩三次，母親雖然有些親戚在香港，在這個時候誰也不敢來親近，而我們更不願意急時抱佛脚低首下心去求人。母親脾氣是很剛直的，寧可吃苦，不願乞

憐，我們且住在小旅館，聽候廣州的通訊。過了兩天，老鄧趕到香港，報告我們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消息，原來父親並沒有到湖南，專在石子嶺的龍王廟等候朱福全的隊伍。在官軍未到之前一夜，父親把官埠的兩三百人遣散往湘南，把方塘幾百人分別送回本鄉，在朱福全到時，父親還嚴正衣冠坐在龍王廟，朱福全還很客氣，稱呼父親爲陳軍門，唯有那個程知縣非常可惡，像審問的詰問許多話。他問父親爲什麼圖謀不軌，爲什麼指揮着人殺傷官兵。父親笑說：「知縣是不配問我的，是否圖謀不軌，到廣州再說，至於殺傷官兵，是他自己動手的，也無所謂指揮着人」。正在那時，四鄉忽然鳴起鑼來，大約還有散不盡的會黨，圖謀劫奪父親。父親頓時大怒，說他們不守紀律，並對朱福全提出條件，他這時束身就縛，是準備犧牲的，但告訴朱福全決不能再有什麼清剿名目，來苦老百姓。在這個緊張局面之下，朱福全也答應了，父親還寫了一張手諭，傳布四鄉，就此隨同官軍算是押解上道，一直解至廣州，經過韶州時還送雷鎮毅一封信，請他不要荼毒無辜的人民，如果當他是首犯，那麼首要已獲，也可對張人駿交代了。

父親到了廣州，張人駿也曾組織一個三司會審，那三個司，一個是藩司胡春霖，一個是臬司王秉恩，一個是督糧道，他的名字，我已忘記了。父親始終沒有供詞，並且對三司說：「我不準備死

，我不會輕易自行來省，我是沒有供詞的，凡問官所要問的，都是真的，祇有聽你們判決罷了』。這樣經過兩次會審，張人駿遂據實奏清廷，並擬了一個『斬監候』罪名，所謂斬監候就是定了斬首，等秋天處決。

事是再沒有希望了，而香港的人們以爲父親的生命還應該設法保存，所以主張不在報紙發表，而寥寥登幾段含糊的新聞便算事。萬分之一的希望還是不能放棄的，我在香港發電和發信到北京，凡是想得到的父親同僚，我都去過信，尤其一位父執華承灑先生是父親的知交，他在廣東做候補道時，和父親是一個道義相向的朋友，那時他在北京，我就請求他設法。無罪釋放是預料辦不到的，若減爲充軍，已是慶幸了。事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當時清廷已改了制度，六部也擴充成十部，鐵良做了陸軍部大臣，鐵先生是滿洲人，在一個時候，他在上海和父親有杯酒之雅，他不大相信父親有圖謀不軌的行動，但因爲證據太確鑿了，所以把斬監候改爲永遠監禁的罪名。這個大案是決定了，算是沒有罪及家屬，算是沒有清鄉，父親就這樣永遠居於南海縣的監獄。在西太后和光緒死時，宣統登位，清廷也曾大赦天下，我自然又設法向總督衙門呈請大赦，但是圖謀不軌是不在大赦之列的，我父親一次曾在監獄內對我說，以後再死幾個皇帝，也不要上呈文，我是預備在此以終餘年的。

自父親入獄以後，我的生活已叙於『少年時代的迴憶』一文中，不再贅述了。這樣父親困在監獄一直至到辛亥的舊曆九月十九日，廣州已響應武漢獨立，父親大踏步出了獄門，傅先生又以革命黨的姿勢，重復活躍，最先他主張組織南韶連都督府，勸何克夫辭職而擁父親爲南韶連都督，父親一笑謝絕，並對我說，我入獄四年，百念俱盡，現在事有人爲，我不願和少年爭長短。父親所謂少年，自然是有所指，當日各路民軍廣集廣州，最初劉永福擁民軍總司令之名，大權旁落，所謂劉永福就是越南戰役和法國打仗的黑旗劉義，也是父親所認識的。那時民軍據着廣州，標掠劫奪，無所不爲，父親有些灰心了，一次父親去看都督胡漢民先生，痛陳民軍之害，非設法整頓不可。胡先生想父親接劉義的任務，父親說，你看我的年紀還能夠負這種重任嗎？況且在監獄經過一次大病，體力都完了，我是上條陳的，不是求官的，後來劉義幹不下去，換了香港益世報的總編輯黃世頌，治安更壞，而紀律更蕩然，每天民軍四出，以捉保皇黨爲名，殺了人還不算，還要剖腹挖心臟去養食，每天民軍先生們提着人心四處跑是常見的事，廣州可謂重復入於黑暗世界了。父親生長軍間，而對革命又抱有無窮希望，至此可以說更是心灰意懶，他當時不讓我當參謀，而命令我當大兵，固然對我屬望太深，恐怕另外更有一重心事，是有激而發罷。

父親當時祇就了一個都督府軍事顧問，兼任了省議會的議員，但父親有他的革命思想，同時也有他的頑固見解，他最看不慣的是一班軍官如鍾鼎基蘇慎初輩的氣焰，更看不慣一班女子北伐軍和女子炸彈隊。一天他在都督府和鍾鼎基等討論軍事，所謂軍事自然是後方的，因為廣東北伐軍已由姚雨平組織並且出發了，父親回家很像有點生氣，在夜飯時還是非常不快，母親問他什麼事，他說沒有什麼，還不是爲了這班小孩子嗎？他們以後能夠不變，才稱得上男子呢！

民國元年二月，南北統一，北伐軍是旋師，而我參加的學生軍也解散了，我當時打算入伍南京，父親倏然不贊成，他不願說明理由，祇說他做軍官做夠了，希望我轉入文的學校。那個時候廣東的學校都停頓了，我祇好先回母校育才書社當教師，以待學校招考。我是在五月回母校，而父親在三月得了中風症，後來身體似乎痊癒，而精神則一天一天衰退了。

父親入獄後兩年，本來是經過一場大病的，醫藥均缺，元氣始終未曾恢復，他對於辛亥成功，也鼓不起興致，未始不因身心衰弱的關係。可是他雖然消沉，對於時局却是樂觀，他所仰望的革命是實現了，他所恨的西太后也早死了，雖然入過獄，但已出乎他意料之外，最初他以爲必死，及致判決永遠監禁，他也無動於中，因爲永遠監禁就等於坐以待斃。我每次入獄見他時，他必問我的學

業，除此之外，對於他的身體，隻字不提，對於他個人的苦悶，更隻字不提。

廣州慢慢已由混亂而歸於安定，所謂民軍，有些是改編，有些是解散了，父親對於政局也表示滿意，在飯後時時掀髯微笑，說一治一亂是歷史的成例，現在已是亂極而治，治世是無機可乘的，少年人還是好好求學問罷。焉知父親逝世至今又三十三年，中國愈來愈亂，這是出乎他老人家意外的罷！

中秋以後，父親又病了，母親和我非常焦急，而他倒不在乎，他反安慰我們，說他的年齡已過了八十，世態的酸甜苦辣已嘗夠了，個人的安樂艱險也經盡了，他不相信就此可以死，就是死罷，也無所怨懟和留戀。他並且說他死後也沒有遺囑，他是沒有財產的，他的志願算已終了，兒子已經知道做人，他更無話可說了。

舊曆八月二十五的下午，我從育才書社下課歸來，父親已經不能說話了，母親還問他有無話說，父親終於於痛苦中掙扎出微笑，勉強說：『我大概不中用了』。自此父親更無話說，延至五時便逝世了。

母親和我葬父親於白雲之麓，三台嶺之陽，樹立一方青石碑，文曰：『陳公志美之墓』，父親

一生的抱負和事業也都附棺埋葬於這一塊地，祇餘下這一頁最後的丁未小史了。

民國三十三年未刊稿

〔乙篇〕

我的詩

我寫完這個題目『我的詩』以後，我自己覺得有些大膽。既然名爲我的詩，應該自己問一問，我的詩究竟好不好？就是好，而我的詩究竟有幾首？

說也慚愧，我姑且不談我的詩好不好，算至現在，我平生作詩大概僅僅一百首左右，在南京一炬，可憐焦土時，僅存一百首的詩稿也燬盡了，現在所能記憶的最多尙不及半數。詩既少得可憐，怎麼敢談我的詩。

不過，這個窮禍也是我自己闖出來的，因爲朋友們許多要我寫字——自然他們不是爲我寫的好，說好聽一點，祇是留紀念——而我偏偏喜歡寫自己的詩，於是朋友們便時時問起我的詩來，要我錄幾首給他們『欣賞』。好罷，反正朋友們已知道了好幾首，我又何妨多寫幾首給他們看看，這是我爲什麼寫『我的詩』的理由。

老實說，我開始記憶來抄謄時，心裏還在猶疑不決，因為我的詩既是那麼少，而又那麼的不好，所謂獻醜不如藏拙，還以不寫為妙。有些好事的朋友看見我在遲疑，又來煽動我，說：『詩無所謂好不好，我們祇要讀你的詩，說到好罷，定義頗難。就是我國的詩宗三百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不是孔夫子刪定，而是我們作的，恐怕人家看都不肯看，更談不到拿來引經據典。李白的「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杜甫的「夜投石壕邨，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迎」，如果不是李杜寫的，而是我們吟的，恐怕人家不屑一顧，要譏為引車賣漿者語。我們不要看好詩，祇要看你的詩』。他們這串大道理，真可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由得使我大膽起來，這又是我為什麼寫『我的詩』的理由。

我的詩實在太少了，與其光是抄詩，不如先寫些我作詩的經過。我記得有一次在酒酣耳熱時候，汪先生曾對我說：『公博，你的詩天資很高，為什麼不多作』？我聽了非常惶悚，祇是笑而不言，我之不言，固不敢言，亦不便言，現在既寫我的詩的經過，就是等於個人自己的詩話，前之所不敢言與不便言者，不妨坦率言之。

說也奇怪，白話體對於我的文章影響很深，自從民國九年，我便很少作文言文，但是對於我的

詩，那就影響很微，甚至乎不發生影響，因為我從來沒有作過白話詩，並且也不喜歡讀白話詩。這或者因為我既不願蓄意做詩人，所以不去注意。既無意作舊詩的革命，又無意作新詩的詞宗，因此還一半的抱殘守缺，作白話之文，謫舊體之詩了。

我之不多作詩，實具有無數理由。我想作詩單靠天資高是不夠的，必得有相當的工力，我自問對於詩，並沒有下過苦工。從前九歲開學，教書先生便教我做小詩。他有一句名言：『讀熟唐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偷』，這句名言，我至今還當作座右銘。然而可憐，我偷的時候便不多，而偷的本領也有限，因為學校的學科太多了，日夜預備，還苦時間不夠。那能騰出時間去偷詩。以此，即使空有天資，其如絕無實學，對於詩未嘗下過水磨工夫，實在不敢多作。

對於詩既沒有下過苦工，自然詩韻不會熟，何況我是一個廣東人，有時謫了一首詩，自己以為音韻鏗鏘，可是一查詩韻，不由得慚愧到面紅耳熱。能不能拿詩韻當隨身法寶，寸步不離呢？我實在沒有這種時間，也沒有這種耐性。有一次二十一年春天某一夜，在南京我在羅文幹家裏正在商討所謂大計，忽聞獅子山邊炮聲大作，其時國民政府正遷都洛陽，我們步出中庭，不勝感慨低徊之至。我謫了一首詩：『徹夜聲聲薄古城，萬家燈暗膽繁星，洛陽宮觀淪榛莽，風雨淒其憶秣陵』。

自己以為很慷慨蒼涼，及至天明回家一看詩韻，誰知城、星、陵、都各有其韻，換一句話，就是全出了韻。我祇有自己原諒，因為我是廣東人，並不是我出了詩韻，實在詩韻出了我。因此從此我便覺有重編『今詩韻』之必要，這一段容後再說，這部『今詩韻』沒有編成以前，我想還以少作為妙。

要多作詩，必須對於『卽事』之外，多作些『卽景』——那就是詠景和詠物詩。人生雖然數十寒暑，但實際說來，更事亦未必多，尤其值得吟詠的事更不見得多。說到詠景和詠物，最不引起我的興趣。我也曾遊過一些名山大川，也會興之所至做過些長詩短句，但後來一讀前人所作，真是令人氣短。原來我所說的，前人都說過了，並且還比我說的佳妙而高明，這樣白費工夫，我殊覺太不值得。因此我決定每逢遊山玩水之時，先買一本關於那個地方的游記或詩集，如此可以舒舒服服的游目騁懷，不至於辛辛苦苦的攢眉苦臉。

作詩有時太自苦，我不多作詩，不祇是躲懶，而且是避苦。前人有句話：『吟成一個字，撚斷幾條髭』。我的經驗，為了一個字，何止撚斷幾條髭，有時十年之中，心還不大自在。十九年我在北平寫了一首詩，到了今日，心還在那裏忐忑。那時擴大會議失敗，退入太原，一班朋友——尤其覃振先生力勸我去天津，但我決心要隨汪先生入娘子關同甘苦。當我離開北平那一夜，我寫了

一首小詩：『險阻艱辛不肯辭，輕生重諾寸心知，拚將肝膽酬朋友，珍重東城判袂時』。一首詩出了兩個『重』字，頭一個『重諾』的『重』是不可以換的，後一個『珍重』的『重』後來怎樣改法都不妥。改得太豪放，失了兒女之情，改得太淒涼，短了英雄之氣。還都那年，請教龍榆生先生代我筆削筆削。龍先生是詩人，拿去了兩天還拿回來，說還是照原稿罷，實在不易改好。我也何嘗不能原諒自己，古詩常有重字，今人何妨稍爲隨和。但是要要知道，這首詩是七絕，統統不過二十八字，二十八個字便重了兩個，工力不足，可想而知，天才所限，何能多作。一個字而至心懸十年，真徒自苦耳！人生本短，何必自戕？

恐怕是一個通則，或是一個尺度罷，詩句最好是淡，最壞是火，我的詩既未工，字又不煉，因此去爐火純青還是很遠很遠，真是『一句還未成，三昧發真火』，衡以我的性格，可謂詩如其人。以前年少氣盛時候不用說，就是現在罷，偶成一詩，自己念起來，很像孫行者陷入火燄山，十萬根毫毛都帶着火燄。朋友們在嚴冬時候讀了我的詩，或者可以增點暖氣，若在酷暑時候讀了我的詩，有拖累朋友中暑之虞，心既不忍，詩便少作，

我最奇怪，或者因爲工力不足的原故罷，作詩好走偏鋒，那就是專做七絕。這個理由並不難於

解釋，七古和五古，我確沒有下過工夫，並且也沒有時間。五律和七律，我又怕翻典故，難排比。我固然不願鬧『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那麼悲慘的笑話，就是『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我也認爲過於堆砌和做作，五絕罷，字數過少，運用不靈，所以祇有因利乘便，專以七絕爲我藏拙之道，因此也不能多寫了。

還有，我最怕做詩人，因爲做了詩人，便不免有詩友，一有詩友，便未免囿於結習，牽於情誼，要結成詩社。從前我觀光過一兩個詩社，使我坐立不安，心想，世界上的集會結社再有比參加詩社難受的嗎？後來我在上海到過票房，倒不期而遇的找到同樣難受的例子，票房是由愛好舊劇的票友組織而成，一班票友無事便在那裏哼，唱得漂亮的，同社票友固然忍不住要叫好。就是唱得糟糕的，走了板和咬錯字，同社票友也爲着面子，要勉強叫一聲好。我是不懂詩和不懂唱的，猶引至詩社和票房爲苦，若真真詩作得好，而要和詩友結詩社，那真未免自尋煩惱了。所以要參加詩社，最好不作詩人，以此我對詩並不刻意求工，恐怕又是原因之一罷。

我還有點對於文人學士們的貢獻，舊日字典因檢查不便，許多人在那裏重編，在前有王雲五字典，最近有辭典會字典，我想一定還有人未能引爲滿意，正在匠心獨運，努力改良，獨至音韻一

書，音早不同，而韻則天不變，地不變，韻亦不變，實在不可思議。我不是基於廣東人便利的偏見，要求重編，而是基於普遍的願望，希望來一個『今詩韻』出版。其實拿聲韻來說，廣東人對於『聲』最熟不過，平上去入，小孩子也天然懂得，但是談到『韻』，那就沒有辦法，一東和二冬，六魚和七虞，固然分不清，就是七陽和十四寒。八庚九青和十蒸，也極容易混而爲一。我更感覺奇怪的，廣東音對於十二侵，十三覃，十四鹽，十五咸，有獨到的辨別，但爲什麼『凡』和『帆』倒收入十五咸，這又是廣東人所不能理解，而我懷疑到古人有極大的錯誤的。但古人有錯誤也罷，沒有錯誤也罷，音是變定了，古今有許多音不同也成爲定案了，韻由音生，我力主非重編不可。我盼望一班文人學士，主持風雅，重編今詩韻，將詩內的『時本通什麼韻』，『古通什麼韻』，就目前的發音，一氣貫通，這樣或者不祇是一種風雅，而且對於像我這樣人是一種慈悲之事呵！

自己的詩話既已說過，以後便就記憶所及錄出我的幾首詩。二十歲以前劍呀血呀的舊作我全忘了，二十歲以後花呀月呀的舊作我也刪了。無已，就民國十四年回國後偶一爲之的詩，依着年份，略抄幾首。同時我想聲明的，我因爲不是詩人，除了偶然出韻之外，在心境愉快，祇是豪談使酒，除非心境苦悶，方胡亂寫些詩，因此我的詩正合着『不無悱惻之詞，惟以悲哀爲主』這兩句話。自然

個儻的詩不是絕無，然而無端之詞也有所託。寫到此地，我又想到中國寫作藝術了，我們知道喜劇不易寫，而悲劇最易作，藝術低下，悲劇爲多，看了近年來的小說和戲劇，恐怕我也不能例外罷。

✦

✦

✦

✦

十四年至十五年，由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以至北伐，是國民革命勃發時期，除了一兩件事使我非常不痛快之外，心情還沒有大不了的苦悶，所作的詩，都在軍中爲多，火氣雖重，哀惻還少。

△與譚組安朱益之登白雲高峯，風雨倏至。

三月風掀渤海濤，天低雲黯將星高，春雷挾雨隨潮起，捲入深巖萬木號。

△軍次樂昌，宿營城外沙洲。廿年前余曾啣先君命捨軍先行，匹馬偷渡峽門，依稀尙憶舊日渡頭也。

獵獵悲風掠莽原，疏星連樹認前村，當年單騎窮投止，月黑衝寒渡峽門。

△酷陽苦入，軍行三日，始過禹關。

三伏行軍越萬山，六師今日過禹關，驕陽着體不知熱，心在幽燕汗洛間。

△舟過衡陽，遠望南嶽，往返三次，終以軍書粟六，不得一登。

三過衡山不許登，汨羅前敵未休兵，層巒挾雨破空至，倒影湘江入鬢青。

△賀勝橋破，屍塞涸川，勒馬前進，馬似厭血腥，人立長鳴，不肯前進，感而賦此。
百里橫屍斷涸川，戰雲霧地遍狼煙，朝陽入眼赤於血，征馬長嘶却不前。

△圍攻武昌匝月，每夜宿南湖。夜深挑鐙草軍書，頓覺有寒意，知秋暮霜降矣。

掩地風雲撼武昌，枕戈橫筆草飛章，深宵劍氣侵肌冷，始覺征袍盡着霜。

十六年武漢大定，調贛主省政，那時的情緒，比較愉快，蓋以不參軍事，遂有閒情。

△卜居百花洲畔。

寂寞樓台對小橋，昨宵寒盡又春朝，曉來試馬花洲畔，梅萼微開雪半消。

△門外春柳含芽，綠入窗中，情不自已。

嫩柳含芽未解情，輕風吹綠入窗櫺，重簾半捲還留住，春意由他自在生。

△楊柳拂地，暮春將去，隱然有歸思。

幾樹垂楊拂地春，倚風愁煞探春人，不如歸去珠江住，笑對梅花證夙因。

是年三月，三中全會召開於武漢，寧漢漸分立，邇後哀愁時多，歡樂時少。

△登黃鶴樓值大風雨。

幾度憑欄幾度愁，大江風雨撼孤樓，蒼穹沉醉人無語，獨立峯頭看亂流。
千年古木空餘骨，百戰功人盡沐猴，大地晦冥天變色，不知何處是神州。

△長沙馬夜事變，奉命往撫輯，至岳州，阻不能前，早起借周鰲山小憩岳陽樓。

淡蕩湖光映早暉，君山輕似片帆微，危樓縮盡煙波意，欲破浮雲天外飛。

十七年在滬辦革命評論，那時雖然不如意事常八九，但以終日執筆爲文，無暇作詩，一年之中，祇得兩首。

△大風雨陳樹人自金陵回，卽赴杭州，作此送之。

一夜罡風烏亂啼，彤雲着地大江低，錢塘景物都凋落，萬樹柔枝盡向西。
楚尾吳頭意興闌，不堪描是破河山，金陵荒落西湖軟，憐煞詩人着筆難。

十八年春赴歐洲，比夏返，終年預戰役，十九年復至北平，參加擴大會議，這時的詩，多感喟之作。

△宿娘子關。

息兵軍令未曾頒，十萬征騎帶甲還，昨夜月明歸夢遠，雄心飛越秣陵關。

△自北平退太原。

險阻艱辛不肯辭，輕生重諾寸心知，拚將肝膽酬朋友，珍重東城判袂時。

△游晉祠並撫唐貞觀碑。

虎步龍行天日姿，中原爭霸盡凡兒，斜陽古柏殘碑在，碧水青山弔晉祠。

△兩次深夜渡黃河。

人語沙中盡楚歌，兩番深夜渡黃河，雄心漸似秋心淡，欲與閑鷗逐逝波。

△過雁門關。

九月涼秋塞草黃，雁門關外已飛霜，馬歸閑廐征袍解，來弔秦時古戰場。

△自大同徵服過北平赴津，適值重陽，早車始發，大雪倏降。

破曉寒鷄四野鳴，漫天風雪過燕京，輪聲似慰亡人苦，碌碌長嘶訴不平。

✦

✦

✦

✦

二十年秋自歐回國，舟過哥崙堡而事變發，在海上寫詩兩首。

△離愁。

抑抑離情淺淺愁，海風吹浪上襟頭，憂深轉覺不經意，斜倚危舷看白鷗。

△海上。

海上淒清百感生，頻年擾攘未休兵，獨留肝膽對明月，老去方知厭黨爭。

✦

✦

✦

✦

廿一年以寧粵合作至南京，在滬五年餘，願有所爲，苦無成就。當時心境，較十七年在上海，十九年在北平，尤爲惡劣，患生在外，疑生於內，我知道不久當有大變。就拿一己事業來說，除了紙上計劃，想做一件小事也不可能。我當日曾對南京同志說過，「你們從前對某某人不滿，輕則開除黨籍，重則通緝，實在還不算高明，最好還是找他到南京做大官，同時使他不能辦一事，這種懲

罰比開除黨籍和通緝都厲害」。我這段話，就可以表顯我心裏的苦悶了。在這個時期，詠景和詠物詩倒有幾首，因為所做的事，都不足形諸吟咏的。

△廿二年元旦，至京初預國府新年典禮。

髀肉重生戰馬疲，征袍脫去換朝衣，酒杯澆盡牢愁在，也自隨班習禮儀。

△閑檢舊笥，見十年前佩刀，鏽生矣，感而寫此。

豪氣銷沉計亦窮，十年遲我愧無功，鋒鏘未盡因時晦，半斂殘書破簡中。

△以開國難會議之洛陽，便道游龍門。

怒濤無際日黃昏，極目中原隱淚痕，駐馬危崖獨惆悵，冷風吹雪入龍門。

△揚子渡頭。

數點微雲秋冷衣，風輕天際遠帆歸，荻花白上詞人髮，寥落江南一雁飛。

△登燕子磯。

燕子磯頭葉半霜，危城夕照兩蒼茫，大江無語向東去，如此河山未忍看。

△暮秋游棲霞山。

最惜秋殘葉未紅，棲霞猶卷綠陰中，夕陽欲語亂山外，遠處微聞孤寺鐘。

△春日游揚州。

二分明月憶江都，曲水輕煙柳幾株，春色漸凋詩漸淡，好將身比瘦西湖。

△每日車過流徽榭，新春忽至，垂柳漸長。

暮暮朝朝此水濱，百無聊賴又新春，三年似爲嗟來食，垂柳迎風欲笑人。

△游西湖入九溪遇雨。

寒雲着水隱山影，春冷樓台啼鷓鴣，一抹淡煙輕棹急，初從雨裏認西湖。

踏遍南山入九溪，杜鵑花裏杜鵑啼，嫩茶綠上村娃鬢，行盡長林帶雨歸。

△題西湖酒家。

收拾豪情付酒杯，胸懷塊磊借相摧，已憐醒後賓朋散，更惜雄心未盡灰。

△廿二年春，北上勞軍，車過黃河橋，有感。

去年海上角聲哀，今又貔貅動地來，還羨江南風景好，梅花依舊及時開。
危坐終宵寐不成，每逢危難此間行，黃河渡口冰猶結，關外遙知正屢兵。

✦ ✦ ✦ ✦
我有幾首詠史詩，總覺得沒有多大意思，而且也似乎太儂薄，現在擇錄一二。

△詠史一

王侯甲第望連雲，雨露春風盡主恩，朝罷玉階香未散，公卿爭拜虢夫人。

△詠史二

司寇花廳出禁城，侍中欵段入神京，當年玉尺齊膺選，今爲憐才避尹邢。

△詠史三

✦ ✦ ✦ ✦
半壁山河夕照殘，少年豪俊盡高官，朝臣懷表當墀立，仗馬庭前仔細看。

✦ ✦ ✦ ✦
無題詩，我也寫過好幾首，所謂無題，自然不能有題，我也知道人家必定說我不能無所指，但我也決不認必有所指，我不願解釋，所以僅僅謄出四首。

△無題一

記得當時認小名，初從琴譜學新聲，十年前事心頭影，春滿江南花滿城。

△無題二

別緒依稀憶往年，落花如雨夢如煙，夕陽紅似離人淚，宣武城頭春可憐。

△無題三

起舞華燈未敢前，胭脂紅上紫金鈿，離愁濃似春雲重，都鎖深壘淺黛邊。

△無題四

無語人前意絕佳，樂聲波動翠雲釵，會心別在深宵後，明月婷婷入夢懷。

✱

✱

✱

✱

至於弔朋友的詩，我僅寫過兩首，一首是廿一年至京弔組安先生墓，一首是十六年冬弔管青。前一首是七絕，後一首是七律。我是最不喜歡寫七律的，獨是這一首，我怎樣也不忍棄去，詞雖近俚，語殊紀實，我想同情於逝者的人，不會譏我爲儂薄罷！

△弔譚組安墓。

彥博一生唯豁度，謝安臨事故從容，百年循吏良臣傳，一字師承在執中。

△過永勝寺。

十六年冬，共亂平後，軍書正粟六，迺莊來見，謂其姊管青已逝世，臨終囑以珠簪相貽，藉留紀念，惻然久之。翌日古君郵我一巨函，中有管青筆記一冊，字以鉛書，中述其對余思慕之懷。古君於函中媵以一牋，謂管青彌留時，坦白述其婚前所念，並囑古君於其逝後，至母家往日居室藏笥，搜其筆記寄余，至管青之棺則暫厝於東門外永勝寺云。得書泫然，夜間把玩遺珠，摩挲筆記，終宵不能成寐。詰旦趨永勝寺，則棺於前一時移去葬白雲山深處，餘香殘燭，無限淒涼，細雨斜風，愈增怛怛，雖欲撫棺一慟，不可得矣。徘徊至暮，寺僧來逐客閉門，始黯黯歸去。余識管青七年，初不知其意有所託，當其臨命之頃，正不必以所懷語古君，而卒語之，古君在悲逝之際，正不必以所知語余，而卒語之，此世之所謂真性情者耶，嗚呼痛矣！

荒寺衰楊不見人，玉簪羅襪倏成塵。遺珠光隱淒涼色，絕筆鉛留慘淡痕。
未燼餘煙魂宛在，已灰殘燭淚猶新。不堪惆悵黃昏後，細雨斜風閉院門。

我的詩能夠記得的就是這幾十首了，至於打油詩也有好幾首，贈人的也有好幾首，我不想再

錄，省得人家作無謂的考據。或者在我身後，等朋友中好事者再代我搜集罷。還都之後，作詩不多，記憶所及，也鈔在下面。

△臨池偶感。

劫後江山異昔時，六朝煙水夢依稀，伴狂未掩心頭淚，漫把柔情託酒卮。
無復豪情振管絃，故將雄語傲人前，最難夜靜佳賓散，楊柳初長月正圓。

△中秋夕倏大風雨。

風雨猶留戰鬥聲，山川草木半凋零，願將憂國傷時淚，洒入銀河洗甲兵。

△三十一年上海日本畫師舉行畫會，請余購白蓮一幅，索價三千。

畫竹多於買竹錢（用板橋句），祇纔半丈價三千，窮官已苦炊無米，也破慳囊購白蓮。

△時感苦悶，隱然有山林之思，欲繪一水雲深處，聊以自娛，然不作畫三十餘年，一木一石，皆不成筆，意境難描，歸去更成幻夢矣。

縹渺仙山夢不通，試描意境也難工，幾時身有雙飛翼，嘯傲天台第一峯。

△奉命東渡，歸期已定，忽爲雨阻，長夜雨聲沁入心脾，不能成寐。

春深三月遍櫻花，長夜無端細雨斜，遙憶天涯初七月，不知今夕照誰家。
瀛海樓遲纔五日，歸思悶損似三年，平添苦雨撩清夢，滴滴穿幃碎枕邊。

✠ ✠ ✠

我不是說不愛作五古七古嗎？就因爲工力不足的原故。最近想寫幾個字補壁，也曾寫過一首五古，雖然是遊戲之作，也鈔在下面。

△長夜偶感。

斜月漸西墜，夜闌苦不寐。茶煙發幽香，愈感寂寥意。萬籟皆絕響，一燈靜相對。清興倏
颺舉，各數少年事，我既歷艱辛，君復傷身世。人生多憂患，太息亦無謂。交誼在心坎，
俗議非所計，性命何足論，肝膽始可貴。哀愁易白髮，歡樂聊自慰，翛然起看竹，且暫覓
佳趣。

民國三十二年稿

偏見

人總是有多少偏見的，如果一個人沒有偏見，或者就夠不上喚做人。

小而至於一種無關重要的嗜好，也是一種偏見，大而至於一種政治主張，也是一種偏見。我從來沒有見過沒有嗜好的人——自然我所謂嗜好，不是壞的解釋——最老實的人也有他的嗜好。同時我從來也沒有見過沒有主張的人——自然我所謂主張，不是專指了不起的主張——最愚笨的人也有他的主張。因此我的結論，如果一個人沒有偏見，或者夠不上喚做人，就是這個道理。

偏見的養成，至為複雜。有些是由於職業養成的。例如中醫絕不相信西醫的科學方法。有些由於習慣養成的，例如看慣直寫的文字，你若把文章橫寫，任你寫得最好，他不顧而且不屑去看。有些是由於經驗養成的，例如一個初到上海的人，被黃包車夫敲過竹槓，他便永遠認定上海黃包車夫都是壞人，甚而上海所有的人也是壞人。有些是由於自私養成的，例如天下人都以為自己文章寫得最好，就是沒有人欣賞贊嘆，他還是非常珍惜，預備藏之名山，傳諸其人。此外養成偏見的原因，

還有許多，因於性格，因於年齡，因於地位，因於環境，因於其他數不清的關係，都可以養成一種偏見。

可是偏見之爲物，其怪不可思議，有時自己可以解釋，有時自己也莫名其妙，無論其爲可以解釋，或者其爲莫名其妙，總是不容易改變。真可謂『自知其短，末如之何』。並且有時偏見之養成，以不能解釋爲其最圓滿的解釋。我時時見一般青年男女在初戀時期，一方最普遍的發問是：『你真愛我嗎？』另一方天然而且不容猶疑的答覆當然是：『我真愛你』。『你愛我那一點？』『我也不知道』。『你既然不知道，爲什麼愛我？』『如果我能夠說出，那也不算真愛了』。這樣以不解釋和難於解釋爲最圓滿和最高的解釋，初戀的男女青年們認爲最理想，最寶貴，會心而微笑，得意而不再言。偏見的實質和內容，總帶些這類糊糊塗塗的典範。

同時偏見之爲物，其害亦不可思議。我歡喜一個人，他什麼都是好的，我憎惡一個人，他什麼都是壞的。婆婆討厭起童養媳，家裏死了一隻雞，是她的罪惡。隔壁失了一隻貓，也是她的罪惡。天上不下雨，而致成爲旱災，也是她的罪惡。乃至世界大戰，而致物質缺乏，都是她的罪惡。總以爲這位少奶奶進了門，天下之水火刀兵皆從而生焉。

然而我想偏見總是一種短處罷，因此我常常自己檢討，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而可以自己說明理由，並且自己認爲無害的，且自由它。有而自己不能說明理由，並且自己認爲有害的，不得不試行修正。我檢討的結果，我的偏見實在比一般人爲多，自然有許多可以說出一番大道理來掩其不善，然而有許多無論怎樣自辯，也無法可以解嘲。我且先說一段沒有道理的偏見，然後再說許多自以爲是的偏見。

我不懂什麼理由，我那雙腳專製造我的偏見。從前我絕對不肯穿絲襪，以爲絲是一種奢侈品，脚是走路的，襪是容易破的，如何可以浪費來用絲織物？因此皮鞋倒願意出高價去買，襪則決不用絲。至到美國留學時，差不多美國學生沒有一個穿紗線襪，我還維持我的主張。在美國無處可買紗線襪，我寫信回到中國，從郵局寄來，要花郵費，要納關稅，我還是堅持這種偏見。不幸這種偏見終於民國十七年被打破了，當時我在上海辦革命評論，上海織紗線襪的工廠都改了織絲襪，要買紗線襪，祇好買洋貨。然而洋貨的紗線襪要比國貨的絲襪貴到兩三倍，所以當時祇好問廉不廉，而不問絲不絲，但是這個決心，還經過許多朋友的說明，又經過許多時間的考慮，方才毅然決然的改變。

奇怪的很，二十多年不穿絲襪的偏見剛剛打破，而不穿羊毛襪的偏見又來。在冬天時候，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肯穿毛織襪。我的見解，以爲一個人的身體是要鍛鍊的，艱難的日子還遠遠在後頭。說不定我將來要到更冷的地方，也說不定將來還要過更苦的日子。倘若把身體養得太嬌貴，將來怎樣捱苦？羊毛襪似乎有兩雙，不知是朋友送的，還是家裏買的，我已記不清。但是每逢冬天，總是我的脚在外邊冷，而羊毛襪則在箱子裏冷，各冷其冷，了不相關。現在我還在鍛鍊我的脚，至於羊毛襪是否在箱內自行鍛鍊，那我祇好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其實我的偏見太奇怪了，如果絲襪是浪費的話，由中國用包裹將紗線襪寄到美國，郵費便已可觀，而況美國的稅率又奇重，自己還要花車費親身到郵政總局去拿。把種種費用加上去，其價值實在比在美國買絲襪還要倍蓰。我爲什麼還是這樣硬幹，自己也不知所以然，冬天不穿羊毛襪，鍛鍊身體的理由似乎正大堂皇，可是每逢冬天，我都容易傷風，證以寒由脚起的醫理，醫藥之費，恐怕還較買兩三雙毛襪爲大。並且我到冷不可當之時，在鞋上加上一雙呢套，呢套可加而毛襪不可穿，到底是什麼理由，我自己實在不能解答，可是到現在的冬天，好似宣誓過，仍然不穿毛襪。

人的偏見真是怪不可解的，已經說過一段沒有道理的偏見，現在且說說自以爲是——卽是以爲

很有道理的偏見。

(一)我有一種偏見，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專以男子作出發點——假使我是女子的話，也許不會有這種偏見——換一句話，就是拿自己作出發點，我拿男子作出發點，自己相信並沒有自大的態度，也並沒有自驕的心理，總以為我既是男子，應當冒人家——連男女都在內——所不願冒的險，應當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

我構成這種偏見，遠在兒童八九歲時候，現在已經忘記在那一本小說上見過一句話『不要辱沒了男子漢大丈夫』。以後這句話便深深印在腦裏。總以為我是男子，應當要比女子更爭氣，男子而又自待是大丈夫，應當要比別的男子更爭氣。自然這種思想充滿了中國英雄和歐洲騎士的氣息，對與不對又是別一個問題，但這種偏見的構成已經四十多年，自己也不想去改正。

我絕不作欺人之談，說我一生不知有危險，不知有困難，其實我的胆子並不大，而性格又最怕麻煩，所以不怕危險不怕困難，原因都基於『我是男子』一個觀念。有了這個觀念久而久之遂把危險和困難另外變成一種特別興趣。我以為天下最危險的終局不過是死，如果一個人冒着險，跳得過去，固然是一種興趣，倘若跳不過去，最大不了也不過是死。好好一個人，無緣無故，無疾無病，

而突然會死，天下有比這樣更興趣的事麼！至於困難，我總覺得天下事沒有什麼困難。我雖然沒有像拿破崙那樣，說法國字典無『難』字。可是我有一個原則，以為無論什麼事，把自己的利害得失攔進去，最簡單的問題也變了複雜。把自己的利害得失剔出來，最複雜的問題也變了簡單。我已經盡了我的力，解決了一個困難問題固然趣味無窮，不能解決，我的責任已盡，對於良心也沒有愧怍。因此人家當為危險困難的，我都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二)我有一種偏見，除了文章上以用字和行文的便利，偶然談談『犧牲』，我在心上實在沒有什麼叫犧牲。我總覺得一件事只有應該做不應該做，並沒有犧牲不犧牲。如果那件事應該做的，就是性命吃了虧，也不能叫做犧牲。如果那件事不應該做的，性命吃了虧，根本上也不能叫做犧牲。退一步不談一件事應做和不應做罷，你既是願意做，吃了虧，也是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也談不到犧牲。換一句粗獷的說話：『身得身當，命得命抵』，實在不必事後抱怨。

我總覺得一談犧牲，便隱然心內等着要代價。以前的革命運動，我沒有要求過代價，今日和平運動，我也沒有要求過代價，我為什麼不要求代價，因為我對於事祇有應該做不應該做的觀念，沒有犧牲一個觀念。我既不談犧牲，遂構成一種偏見，最討厭人家說犧牲，一聽人家說、『我為這

事犧牲很大』，心裏自然而然的起了一個反感，那個反感就是立刻懷疑這位談犧牲的朋友，不是故意瞎吹，就是希望代價，最少也是以義始而以利終。我這個思想，不是高調，而是最低的想法。

(三)我有一種偏見，我生平絕不信倖運，祇有信本領。什麼是本領，精幹固是一種本領，老實也是一種本領，有許多人瞧不起人，常說『你看某人，笨到那樣，也會得意，他真是倖運』。殊不知『笨』就是一種本領，他因為笨，所以不會欺負人，他因為笨，所以不會誑騙人。笨到出名，人便相信。小事託了他，老實幹去，大事託了他，也老實幹去，這樣事業便成功了。

我們要知道，社會是人組織的，事業是多數人成就的，一個人沒有多數人的信任，他的事業絕不會成功，經過數十年的經驗，我更養成一種偏見，最愚笨的人能夠扒得起，他必定有一種本領，最聰明的人一下跌下去，他必定有一種毛病，我們不知道以為有幸有不幸，祇是我們沒有發現他的本領或毛病罷了。

(四)我有一種偏見，對公家絕對的節儉，對自己非常的浪費。但我聲明，我這種行為是由少年流浪生活所養成，絕對不可為訓，然而既有這種偏見，不能因為它不好而不自白。我對於公家真可以說不浪費一文，可是我對於自己，那就大謬不然。我根本沒有儲蓄性，抱着半通不通的理解，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不過因為沒有儲蓄性，反一方面也有好處，同時也沒有投機性，我一生固然沒有靠過政治來投機，也鼓不起興趣來囤積。無論聽見那一位朋友碰着機會撈了幾十萬或幾百萬，我心裏絕沒有半點搖動，自己想來一下嘗試。

我這種偏見，大概也有點遺傳，我父親就是一個揮金如土的人，我總覺得沒有錢時是人用錢，有了錢時就變了錢用人，有了錢總得要替錢想辦法，把它存在銀行哪，把它用在生產哪，這樣打算盤，用心計，可以使你失眠，可以使你大病，一個人心裏一面要從事政治，一面要安頓金錢，我自問確是能力不夠，時間不許，倒索性不去想它，比較舒服。

至於私人的浪費，自己就覺得太過。我的脾氣，無論什麼，總有些奇書古畫不論價，到店裏買東西，價錢是不講究的，貨物是不選擇的，祇求心愛，不論價錢。不過話又說回來，我的浪費，只以我分內的能力為限，我從未求分外的金錢，求自己的享樂。這個偏見終是不好的，如果國民個個都像我沒有儲蓄性，國家一樣會窮乏的。

(五)我有一種偏見，我一生心內沒有私人的敵人。我以為要成爲我的敵人，必定要是我的對手，例如下圍棋罷，必得兩方工力悉敵，才是對手；又例如角力罷，必得兩方旗鼓相當，才算是對

手。或者在政治或者在其他方面，人家自認是我之敵，我決不承認他是我之敵，這種偏見或者是阿Q的心理，然而成了一種偏見，我沒有方法可以改正。

我以為認定對方是一個敵人，至少要分量相稱，譬如拳鬥，也要分開體重和體輕的對手。我也曾碰過造謠言中傷我的，也曾碰過用陰謀來誣陷我的，我不獨不認爲敵，並且很覺得無聊。我以為要做我的敵人，先要指出我的理論不當，或者我的行爲不對，然後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來攻擊，那才配得上是一個敵人。如果用謠言，用陰謀，那不過是暗算，實在算不得好漢，他既非好漢矣，而我硬認他是敵人，這不是辱沒了自己麼？

(六)我有一種偏見，以爲我自己的個人和自己的事業是分離的，我時時發出一種奇感，坐在辦公室的我和出了辦公室的我是兩個人，這種奇感，也有一種好處，也有一種壞處。所謂好處就是公私分明，就是對於僚屬罷，我除了萬不得已的事，不會命令僚屬過了辦公時間才退班，更不會命令僚屬辦我私人無涉於公家的事件。所謂壞處就是充滿了浪漫氣息，我從來不注意我自己的風度，也不注意我自己的威儀。以前我會一個人去看電影，會一個人去食小館子，會一個人在馬路上散步，會一個人駛汽車，在實業部每逢下班時候，把辦公室的門順手一掩，心裏想：『部長陳公博先生且

請在裏面，我自己的陳公博先生是出去了，再會罷！」

幾十年來，每當我退食自公，我待遇自己還是當我是一個窮學生，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食好的東西，要住好的房子，要穿好的衣服。深切的朋友都替我着急，尤其替我身體着急，而我呢，倒行若無事，處之泰然。這種偏見，我想對於國家似乎有點害處，但成了偏見，無從補救。

(七)我有一種偏見——以下要涉到政治問題了——我絕不相信天下間有被人包圍的事。我固然不相信會有人可以包圍我，我也不相信有人可以包圍人。我時時聽到不少人對於政治上的批評，說某某人受了某某人的包圍，並且也時時聽見我受了某某人的包圍，我都一笑置之。據我的經驗和觀察，天下最愚笨的人也有他的主張，如果一個人會受他人的包圍，實在並非他受了他人的包圍，而是他受了自己的包圍。古書有句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真是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如果一個人受了他人的包圍，必定那個人和所謂他人的性格相同，思想相同，或者是利害相同，乃至等而下之嗜好相同，這個人才可以受他人的包圍，否則絕不會一個人會受別人的包圍。我們且不必談政治，也不必談成人，且說家庭中的小孩子罷，家庭的環境是單純的，小孩子是沒有意見的，父母是絕對有權威的，然而小孩子也有時不聽父母的教訓，如果說一個人可以包圍一個人的話，小孩子

絕對不會有主張了。小孩子也不會受包圍，而我們偏說一件政治大事而可受包圍，豈非天下之奇談！而且包圍兩個字的意義，最少不是一件事，而且絕不是短時期，一個人一切的事，而且是長期中受人包圍，我可以判斷那就是他的一種主張而不是受包圍，我們整天替所謂被包圍的人耽心，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八)我有一種偏見，我以為天下沒有蠢人，如果你以為天下有蠢人，那你就是最蠢的一個。我唯其不相信天下有蠢人，我也不願意做蠢人，因此我絕不肯拿說話或行爲去騙人，我們且不談政治，說說做買賣罷，如果一個人真是貨真價實，不管他生意壞到怎樣，自然而然的會發展，倘若他偷工減料，縱使他的買賣得意，遠則一年，近則半載，也祇有關門。

人祇會給你騙一時，不會給你騙永遠，做買賣是這樣，政治更是不待言。政治是國家的事，不是私人的事，從事政治尤其是大多數人的事，不是一個人的事。一個人任你有天大本領，倘若你的主張不對，國人不會擁護。倘若你的言行不符，就是所謂自己人也會破裂和分離。每個人對於本身利害都是聰明的，對於國家利害也是聰明的，如果你以為可以騙人，首先便騙了自己。因此我的偏見，對於政治最重要是誠實，我們不要計個人的成敗，最要緊是不要對人家作欺騙。

(九)我有一個偏見，但我未曾表示之前，先敬向婦女們三鞠躬致敬，我的偏見就是以爲婦女實在不宜於政治。我並不是說婦女們的見解不及男子，她們有縝密的頭腦，見解有時超越於男子。我也不是說婦女們的知識不及男子，她們有同等的教育，知識有時超越於男子。我不贊成婦女參預政治，實在有幾個重大的理由。第一、政治有時很高深，有時真是很骯髒，就拿每天來見你的人說罷，有幾個人真是說老實話。有些人要你動聽，有些人要你搖惑你的觀聽，有些人更要轉移你的觀聽。以我們每天接見無慮十數人乃至數十人，以我們經驗少至十數年乃至數十年，還有時上當，並且時時上當，何況婦女們在家時多，在外時少，安能一一去判別？第二、政治上最不能用感情，婦女們最大的長處就是感情，假使婦女沒有感情，家庭便不能維持，兒女也不能撫育，人類也不能繼續。然而婦女天然之所長，就是政治之所短。我也有一種毛病就是太富於感情，因此我常常慨嘆我『入錯了行』。婦女們因爲富於感情，於是接近的都是好人，不接近的雖不全是壞人，也不見得是好人，於是很容易變了與我好者爲好人，與我惡者爲惡人。政治一偏感情，結局必成惡果。第三、婦女們是純潔的，而政治有時真是醜惡的，拿上海市長來說，上而至於政治和經濟固然要知道，下而至於所謂娛樂場的賭窟，和所謂風化區站在街頭可憐人的情況，也得要知道。婦女們爲什麼把這

些不堪的事混在頭腦呢，又誰願意把這些不堪的事告訴婦女呢？第四、政治上的輿論不全在報紙的批評，有時街談巷議還比報紙為重要。婦女們終為環境所限，難於週知。耳目偶有所蔽，行動必少顧忌。政治上固然顧忌太多，不能有作為，然而顧忌毫無，也必至無所不為。

還有政治上的問題，常常影響家庭的生活，家庭是什麼？我承認至少是一個人的避難所。一個從事政治的人，每天在外受盡了無窮冤氣，聽了許多不入耳之言，心裏總想回到家裏可以休息，更希望暫時忘記了一切，來恢復他的精神和健康。然而回到家裏反而因為政治見解的異同，或爭論行政上用人的當否，兩夫婦有時辯論到大家鼓起腮兒不食飯，甚至於半夜三更在床上吵起來，正襟危坐以待天明，這真是難乎其為家庭，更難乎其為政治了。

我一氣寫了我許多偏見，還有不願寫的許多無關宏旨的偏見。我開頭不是說過：『人總是有多少偏見的。如果一個人沒有偏見，或者就夠不上喚做人』。不過我的偏見太多了，有這麼多不成理由和偏於成見的偏見，或者也夠不上喚做一個好人和完人罷。偏見偏見，自知其短，末如之何！

了 解

人生本來是難於了解的，個人的性格尤其是難於了解。

公生活的性格似乎比較容易了解，而私生活的性格就不容易了解。

單純性的性格似乎比較容易了解，而複雜性的性格就不容易了解。

所謂公生活的性格，例如一個人很誠實，相反的很虛浮，這容易了解了。可是這個人的私生活，誠實的人也會浪漫，虛浮的人也會嚴肅，這都可以使你不能相信。

所謂單純性的性格，例如一個人很躁暴，相反的很溫和，這容易了解了，可是這個人的私生活，躁暴的人也會遷就，溫和的人也會強硬，這也可以使你不能相信。

我時時都在想，個人的性格的確是難於了解，因為一個人不是單由父親生出來，或是單由母親生出來，是合體構成而產生的。我們除去一切父母的特殊性格而外，又除去隔代遺傳的性格而外，一個人至少包含男女的兩種性格，祇是看他或她所受的遺傳，男性多或是女性多，或者就是男性少

而表露時多，或者就是女性少而表露時多，來決定他或她的性格罷了。

因此我想公生活和私生活的性格，往往不同，或者就基於這個原因。而單純性的性格，我斷定祇是一個名詞，誰的性格也相當的複雜。如果他能夠比較中和的便容易了解，不能中和的便難於了解。

我們時時看見在人家廳堂所掛的名人字畫，有一副很普通的對聯，而又爲名人所喜歡寫的，『將相經綸儒學問，聖賢肝胆佛心腸』。這副對聯自然是一種最理想的人生，可是我們想一想，一個人有將相的經綸，有儒的學問；有聖賢的肝胆，又有佛的心腸，他的性格如何的複雜。固然世間決沒有這種人，如果有這種人，他一定每天都在矛盾中，不獨人家不容易了解他，就是他也難得了解自己。不獨他自己覺得痛苦，恐怕他的最親切的家人和最親愛的朋友更感覺痛苦。

我平常時時自負可以了解人，到了今天，覺得有些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我深深感覺，我不祇不能了解人，並且往往不能了解自己。我現在不敢相信去了解人，我且試試了解自己罷。

我的公生活性格是最容易了解的，我在『四年從政錄』內，曾下過一句『自己的批評』，我說『開宗明義，我很想先對於自己下一個批評，我的爲人可以用兩句話作定論，就是『長於決斷，短

於精密，勇於負責，過於信人』，我自問我批評自己的評語比較確切，而一般朋友也認爲我自己的評語很是確切。

至於我私生活的性格就難於了解了。我對於自己私生活的性格，至今不能下斷語。我有一位朋友曾說過：『你的性格，可以做聖賢，可以做英雄，但聖賢和英雄是矛盾的，你要做聖賢，就不能做英雄，要做英雄就不能做聖賢，兩樣人物不能合一，你得要下決心去選擇』。他的說話姑且不去說他對不對，但最少他看出我在私生活有矛盾的性格。我又有一位朋友曾經取笑我說：『你是君子中的浪漫者，浪漫者中的君子』。我笑笑說『那不是相消了嗎』？他說絕對不能相消，兩種人物同時在我身上存在。他這句話自然是開頑笑的，但最少他也看出我在私生活有矛盾的性格。

這樣對於我的私生活性格批評太多了，祇有一個朋友說：『你的性格，是豪放之中不失溫文，瀟灑之中而帶嚴肅』。我自己也承認這句話比較切當。然而不錯，話是切當了，那就十足表示我具有不能中和的幾種性格，難怪人家不容易了解自己，自己有時也不容易了解自己。

有了這些矛盾而不能中和的性格，因此所交的朋友，自然跟着性格而有種種的不同，所以我有跌宕的朋友，有文雅的朋友，有風趣的朋友，也有蘊藉的朋友。雖然說不上情投意合，但總是我的

朋友，而又是我喜歡的朋友。一般朋友的性格雖然互相矛盾的，但我四種性格之中總有一種符合，因此有點『冠蓋滿天下，知交有幾人』之感。我相信我對於朋友的了解，也祇是合乎我的某一種性格的了解，而朋友對我的了解，也祇是合乎他的某一種性格的了解，如果彼此全部了解，恐怕也是困難罷。

我時時想，我能不能碰到一個朋友，他也是豪放不失溫文，瀟灑而帶嚴肅：不過我再想想，這種人是可遇而不可求，就可求罷，也不見得真能做朋友。因為四種性格並不是中和的，各自帶些矛盾性的，而這些矛盾性不是繼續存在的，而是時現時隱的。有時我豪放，而他溫文，有時他瀟灑，而我嚴肅，豈不是自己常在矛盾中，而自己和他也常在矛盾中嗎？豈不是彼此更難於了解嗎？人生了解之難，真可慨嘆！

性格有一部份是先天來的，也有一部分是後天來的，換一句話是修養來的。我檢討自己的先天性格已如上述，我再試試檢討我的後天性格。後天性格，換一句名詞，就是氣質，再淺白點說，就是脾氣。我的修養，我保持兩個原則，其一是我所難能，弗出之口，其二是己所不欲，勿施諸人，我略略說明第一個原則，然後再說明第二個原則。

我常常批評我是中國的第二流人，怎麼說？第一流和第二流是難得定標準的，我的標準是自己選定的。我以為一個人能夠做到知行合一，是第一流，其次能夠做到言行合一，是第二流。我知道喝酒不好，可是時常醉倒，我知抽煙不好，而煙捲常在手中，知之而爲之，知行合一之謂何？我自己選定第一流人的標準，我是沒有資格去做了。但言行合一我一定非做到不可，因此我估量我能做的才說，我不能做的就不說，同時我估量我能做的，才叫人做，我不能做的也不叫人做，不但如此，我估量我能做的，才批評人不應不做，我不能做的，也不批評人不願去做。我這種修養，我自問有點把握，同時深覺於己於人，都是有益。

至於第二個原則，也自問有點把握，可是於人有益，而於己則受苦無窮。這個理由說出來也太簡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對的，但反過來說，己所不欲，也望人勿施於己。但是人家對於自己是不易了解的，人家的修養原則不見得和你一樣的，人家的欲與不欲並不是和自己相同的。我現在說說我的不欲，附帶說說我的苦處。

一、我最『不欲』解釋 我自小就不喜歡解釋，無論何事，祇求心之所安。我認對人解釋是一種可恥的行爲，我平生也曾被人誤會了好幾次，但我總不願意解釋，也被人中傷過好幾次，我也

總不願意解釋。不過我雖不對人解釋，而朋友們却時時對我解釋，或者託我向別人解釋，我自己已怕解釋。且怕聽人解釋，何況要代人解釋，這是一種苦處。

二、我最『不欲』表功 我生平最不喜歡丑表功。因為凡事我覺得應該做的才做，不應該做的就不做。既應該做矣，又有何功可言？既無功矣，又從何表起。不過我不向人表功，而人家却喜歡向我表功，而其表功也不止一次，昨日見面已聽見過他自陳功績，今日見面又聽他一遍自陳功績，明日見面又聽他三次自陳功績，若拒而不聽，又恐予人以難堪，這是一種苦處。

三、我最『不欲』算賬 我最不喜歡算舊賬，『成事不說，既往不咎』，我在小孩子念四書時便認為很有道理，我不獨對朋友不算舊賬，連底下人都不算舊賬。因此我不大發脾氣和罵人，譬如一個底下人打破一隻茶碗也發一頓脾氣罵一次，似乎大可以不必。那隻茶碗破了，並不會因你發一下脾氣，罵一下人，那茶碗便可以立刻自己會金甌復元的。算舊賬祇有多加一重彼此的刺戟，於事無補，於情有傷。不過你不向人算舊賬，人家偏向你算舊賬。一個人最難過的，你不向人算賬，而自己又正在後悔，人家一定要算舊賬，更且天天要算舊賬，這是一種苦處。

四、我最『不欲』囉唆 我最不喜歡囉唆，無論何事，斬釘截鐵，三言兩語決定了，行就

行，不行就不行，何等痛快！一個人有過失罷，明明白白說幾句，使他知道自省便完。偏偏有種囉唆的朋友，昨天囉唆一大頓，今天也囉唆一大場，拖泥帶水的胡言，牽絲板籐的亂語。我寧願給人一刀斬了，痛快異常，最怕是蒼蠅般嗡嗡，蚊蟲般噉噬，你雖不願意，而人却喜歡玩這種脾氣，這是一種苦處。

五、我最『不欲』尖刻 我最不喜歡尖刻，而我在少年時却頂會尖刻的，因為我知道尖刻的刻毒，我發誓再不肯尖刻。時常我說話時，先審量過這句話會不會使人難受，然後再出口，我以為罵人還不失為磊落，我不高興便罵，罵人雖不好，但罵是要人改過。尖刻便不同，尖刻也許是要人改過，不過他不存心一定要你改過，而存心先要使你難受。我不願人難受，人家却偏要你難受，甚或以你的難受，作他的滿足，這是一種苦處。

我的『不欲』太多了，一時也數不清。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我是守住了，而人家也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者人家對這個原則也會守住的。然而彼之所不欲，或非我之所不欲，彼之所欲，更非我之所欲，因之天下多故，而朋友之際男女之間遂從此多事了。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孔子教訓我們的，原則是絕對好而沒有疑問的，然而其苦如此，可見天下

事真有時不可思議了。我以為上述種種我之不欲是一種優點，有些朋友却認定是我的弱點，且有些乘其弱點，便其所私。我常常聽見，也深深知道，外間流行一句話：『那位先生最怕囉唆的，不會使人難受的，他不答應的事，你囉唆多幾次便成功了』，嗚呼修養！其苦至於此耶，而其害又至於此耶！

我開端會說過，人生本來是難於了解的，個人的性格尤其是難於了解。我希望一般人們都對我了解是困難的，我希望少數朋友能夠對我了解便很快樂了。現在我知道要少數朋友對我了解也是困難的，祇希望有一個人對我了解便很快樂了。

我最理想至少有一個人能夠澈底了解我，無論何事彼此不解釋，彼此不表功，彼此更不算賬，不囉唆，尤其彼此諒解和尊重，彼此相知而不明言，一切相喻於無言。可是天下有這個人沒有呢？其實我自己有時且不能了解自己，何必希望再有了解我的人。我相信世界不會有了解的人了，就有，恐怕也在天之涯海之角罷！就有，恐怕也在咫尺而蓬山罷？就有，恐怕也……罷！

貧賤交與富貴交

自從後漢宋宏對光武說過：『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以後，這兩句話遂成爲世上的名言，或者這兩句話不是宋宏所創造，而是當時的一般傳說，但自經宋宏說過，載之史乘，於是人人的心中都有了深刻的印象。我今天祇是論友，不是論妻，單談貧賤之交，並且順便帶論富貴之友。

貧賤之交不可忘，是表示一個人的道德，猶言身雖富貴，不忘故交，這是何等高義薄雲，深情如海，但不忘朋友是一件事，在不忘之下而和朋友疎遠起來又是一件事。我是被認爲富於感情的一個人，而朋友呢我是不會忘記，可是在一個時期似乎總有一個時期的朋友。我祇管不忘記，有時自然而然的會和朋友疎遠。我祇管不忘記，有時朋友也會自然而然的對我疎遠。我覺得非常詫異，也覺得非常惋惜，而且我更感覺貧賤之交固然會疎遠，富貴之交更容易會疎遠。這是什麼緣故呢？那不能不檢討了，那不能不自省了，誰知一檢討，一自省，倒找出許多平日不經意和不便說的材料來

。我想這也是社會問題之一罷，我何妨像一個大學教授把研究所得，作成論文，公開誦讀。

朋友是中國五倫之一，但朋友兩個字至爲籠統，按古書解釋：『同門曰朋，同志曰友』，這樣，無疑的有些朋友是由於感情結合的，有些朋友是由於理智結合的。感情是比較單純，而理智卻包羅萬象，主張的變化可以影響友誼，事業的變化可以影響友誼，地位的變化可以影響友誼，更有在感情理智以外的，興趣的變化可以影響友誼，體質的變化可以影響友誼，尤其家庭的變化更可以影響友誼。到了一種變化，祇管維繫住感情，而朋友則不期然而然的疏遠了。我這種分析，或者似乎過於科學，不過我要表示心得，每一分類，都想舉一個小例，否則語焉不詳，反使人讀之不解。

人的主張變化是可以影響友誼的。我所謂主張，並不是專指政治主張那麼大的題目，可是政治主張確可以特別影響友誼。美國從前有兩夫婦，當大總統選舉時，丈夫是贊成共和黨的人，而太太倒贊成民主黨的人，兩夫婦日夜吵鬧，卒至離了婚才算了事；夫婦如此，朋友可知。我時常看見兩個不同的黨人固然絕不相容，就是一個黨內的小組織也是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互相攻擊，甚至互相殘殺。因此我感覺兩個朋友中，一個有了主張變化，縱不成仇，也會疏遠。

事業的變化也可以影響友誼。我想古書所謂『不同道，不相爲謀』，所謂道固然是一種主張，

而事業也可算一種道罷。凡一個人事業的變化，他的注意力也隨之變化，做官的人改了行經商，對於高談政治，除非見獵心喜，未免覺得無聊，而做買賣的人，一行作吏，免不了大談其滿腹經綸，對於一般行市，自然減少興味。這樣，兩個事業不同的朋友，就是杯酒言歡，聯床夜話，除了談家常，數往事，彼此都感覺話不投機，索然寡歡。

地位的變化也可以影響友誼。同一朋友而地位變化，最可以妨害交誼，傾蓋之交，總角之好，因於地位的變化，常常可以疏遠。大者不必談，即小節也發生極大的影響。平時朋友登堂入室，有客也可闖座，入門不必傳呼，但是地位變了，彼一朋友未必是此一朋友的熟人，入門縱使不必傳呼，而有客卻不能闖座了。心眼稍窄的朋友，以為你人一搖身，便限高於頂，這種負義之友，何必再交。而你則以為這位仁兄，不通人情，不諳世故，縱然冷淡，也無憾焉，於是兩人之交慢慢疏，更由慢慢疏而慢慢絕了。還有自命骨格嶙峋的人，以『天子不得而為臣，諸侯不得而為友』自况，你的地位稍高，他的形跡自遠，你還不忘貧賤之交，他先謝絕富貴之友，這也是世間不少的例子哦！興趣的變化也可以影響友誼。興趣之為物，有時隨着年齡變遷，有時隨着體力變遷，更有時隨着環境變遷，所由之道不同，而其變遷則一。我以為朋友相交能最密切者，莫過於興趣相同。政治

問題，大者最多討論數日，便可以決定方針，小者則三言兩語便可以獲得結果。談時正襟危坐，別時肅袂踴行，若要兩個人不斷流連，互傾肝胆，恐怕除非興趣嗜好相同，不會有這樣密契罷。但人的興趣是會變化的，年齡日長，世事看穿了，體力減退，心有餘而力不足了，環境變易，非不爲也，是不能也。以此而與平昔興高彩烈的朋友聚在一起，人家視爲多餘的人，而自己也感到爲無聊的事。足跡既罕到盛會，而友誼也從此疏遠了。

體質的變化也可以影響友誼。說到體質的變化，或者因年齡衰老而變化，或者因疾病侵襲而變化，有些是自己感覺到的，而有些自己未必感覺到的。體質變化，自己便難於控制感情，若神經受了刺激，更失卻尋常的理智，朋友雖然一部分由理智交來，但維持友誼卻以感情爲主。身體衰弱，脾氣容易發了，世間朋友有幾個願意做人的洩氣袋，祇好敬而遠之。神經刺激，行爲突然變了，朋友們就是對你敬罷，然而不能無所畏，也祇好愛之於心，而疏之於跡了。

家庭的變化也可以影響友誼，這一個例，我想最是普遍而人人可以深味的。人未嘗沒有堅持獨身主義的，但在中國是少數中之少數。人既是有太太，則人在太太與朋友之間，有時實有說不出許多的困難。我爲什麼要交上一個朋友呢？因爲我的兩隻眼睛看見那位朋友是值得交朋友，我一個腦

袋感覺那位朋友是值得交朋友。但有了太太則不然，搖身一變，兩隻眼睛變爲四隻眼睛，一個腦袋變爲兩個腦袋了。你以爲那位朋友值得交朋友，你的太太不一定以爲那位朋友值得交朋友。談到政治主張的不同，個人見解之互異，那是太大了。姑且談瑣碎無足重輕的事情罷，太太以爲那位朋友太相豪了，或者以爲那位朋友太隨便了，更事小之又小者，太太以爲那位朋友愛吐痰，以爲那位朋友不喜歡洗澡，更以爲那位朋友不大愛換襪子，在在都可以使她向你提出異議，甚至拒絕朋友的光臨。太太不喜歡的朋友，而你偏歡迎他到家裏來，懂得大體的太太可以等朋友走了，在無人時向你埋怨，稍爲率直的太太便忍無可忍，其沉着的還可以鼓瑟而歌，使之聞之，若衝動的簡直戟指而罵，鬧得彼此不歡而散。自然你會對太太不滿意，但經過若干次的考慮，何苦爲了一個朋友終日和太太吵鬧呢？終不成爲了交一個朋友和太太離婚嗎？又終不成爲着太太的不滿而和朋友絕交嗎？祇好背後打恭作揖，向朋友道歉，請朋友原諒，不過祇管道歉，祇管求諒，而其中有不能不互相了解者，就是以後少來往，以維感情而省麻煩。

我以上所說的還不過專指一方，倘若朋友也有太太，那麼兩隻眼睛便變了八隻眼睛，一個腦袋便變了四個腦袋，世界上對於一個人的鑑別，要八隻眼睛都同一樣的觀察，四個腦袋都同一樣的感

覺，那真是千難萬難了。爲着家庭的問題而疏遠朋友，我想有時倒不是斷絕了友誼，反而維繫了友誼，這又是朋友疏遠中別開生面的看法。若因太太不喜歡一位朋友，而你也不喜歡那位朋友，甚至有時情急，初則謾罵，繼則掄拳，世間也有不少這種好漢，但我終以爲不可爲訓，而置諸不議不論之列。

談至此地，我似乎可以論論富貴之交了。據我經驗，貧賤之交似不易忘，而富貴之交倒似易忘，何祇易忘，并且易於交惡，我有長期的經驗，聽我簡單道來。

凡是從事於革命的朋友們，在革命失敗時候，大家躲在一個逃亡地方，朝夕見面，甚至時刻相對，彼此無話不說，無事不知，就是有些意見，彼此說過也算了，甚至面紅耳熱罵過也算了。可是大家上了台就大不相同，各有各的職權範圍，各有各的方針政策，尤其難的各有各的部下。彼此不滿意，很難坦白進言，尤其不能像失敗時早上破臉，晚上握手，因爲大之可以影響政局，小之也不成體統。因此祇好閉在口裏，悶在心頭。這種悶，明知是不妥當的，是要悶出事的，然而不悶又有何法可想？於是彼此門戶便分了，意見也有了，朋友也就疏遠了。

還有，似乎是一種定律，官越大的，他的脾氣也跟着擴大，對於這一個莫名其妙的『似定律』

我常常自諒，也常常諒人。一個繁忙的人在一天辦公時候，要見許多不願見的人，要聽許多不願聽的話，已使你難於忍受，假若身體不適，天氣變遷，肝火更易上升。不過對部下發發脾氣也許不成問題，對朋友稍發脾氣，那就是發生意見。因為那位朋友也是脾氣跟着官階擴大的，他的忍受也和你了無異致的。他的脾氣已無地可發，碰着你的脾氣又迎面而來，就等於兩隻轟炸機相碰，非爆不可。政治的原則是相忍爲國，原則一動，根本成爲問題，好像政治的朋友們，一紅了面，便難恢復原狀，這不僅是交疎，簡直易於交惡了。

而且在革命時期，除同志以外是無兄弟親戚和知交的，那時真是六親斷絕，朋友分離，但上台以後，親戚和知交都來擁護了，他們不止要來，並且還要攬大權，管機要，這麼一來，所謂同志者便物議沸騰，怨聲載道。如果那個人真喜歡用親戚和私人的還不算冤，倘若那個人本來不喜歡用親戚和私人，受了同志們的怨懟和惡評，脾氣好的還知道忍耐和自省，若脾氣壞的索性把心一橫，而和勸他的朋友作對也事所常有。

其次，一個人既然上了台，少不免有許多部下，人事複雜，是非自多，有些自己部下做了壞事，朋友們會懷疑到與自己有關，有些人家的部下做了壞事，故意牽上他的上司頭上。那時做朋友的

，問也不是，不問也不好。要朋友好的自然表示不滿意，不滿意便是有意見，不要朋友好的不免背後批評，評批起來意見更是惡化了。并且世界上不少一班興風作浪惟恐天下無事的朋友們，有些是要你與某人不和，他才可以表功，才可以取利，就不表功不取利罷，他可以圖一時之快，洩一己之私。於是無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大事，朋友固疏遠，而天下也從此多故矣。

貧賤之交如此，富貴之交又如彼，朋友，朋友，亦難乎其爲朋友也乎！

民國三十二年未刊稿

不可爲的官

官，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方面是最可貴的，而一方面是最可鄙的。爲什麼最可貴？除了官的權力可以左右法律，生人殺人——照一般的想像——還可以發財。爲什麼最可鄙？也在於他的權力可以左右法律，生人殺人——尤其在於容易發財。

財是人人想發的，不過發財在尋常人要出本錢，要賣力氣，最少還要碰運氣，而在官呢，照一般人的想像，一做了官便不必出本錢，不必賣力氣，不必碰運氣，自然財源如『不盡長江滾滾來』，很像『無事家中坐，財從天外來』！

的確，舊日的中國社會不知從那裏想起，專以金錢和女人來鼓勵人讀書，由讀書而做官，最普遍的如社會的傳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照這樣說，做官一定能發財，而陞官自然也跟着更發財，這是一個毫無疑義的定律。就是算命的命書罷，每一紙命都有『妻，財，子，祿』的分格，至於本人是否做官，是另一問題，而命宮却非有一個祿的分格不可。若有祿而不

能做官，祇好牽強加以別的解釋，很顯然的非一般人所願聞，而祇好嘆一聲『是有命焉』。

的確，在很遠的中國歷史記載，似乎做官發財也是普遍的事實，我們在小孩子時候，開始念左傳，便讀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可見官的不好，是自古已烈，於今亦然。而且無論在那一個朝代，都看見『整頓吏治』，和『澄清仕途』的名臣奏議，因此我常在想，『人心不古』是我們所引為長太息而甚至流涕的，但什麼時代才算古呢？恐怕唐虞之世，假定有詳細的歷史記載，亦復如之。興念至此，連思古之幽情，也不敢發了。

然而有了國家，自然有政府，有了政府，自然有官，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而可為，這兩句話又擾亂一般人的神思了。據我二十多年的觀察和經驗，凡是想做官的人，和初做官的人，無論誰都是抱負非常之大，理想非常之高，除非他蓄意發財，未有不廉潔自矢，迨至後來隨俗俯仰，與世浮沉，就因為他的週圍有不斷的威脅和誘惑。舉凡社會，朋友，親戚，乃至底下的老媽，廚子，對於每一個官的威脅和誘惑都非常嚴重，目前的非常的生活壓迫還在不議不論之列。科里耶會說過『人是環境的產品』，一個人要想超乎寰外，游乎寰中，不見得能優游而容易罷！

我先說說社會的威脅，一般的社會，在外表上對於官的廉潔是恭維的，贊嘆的，對於官的貪污

是批評的，詈罵的，不過反一方面在實質上，不止以貪污待官，更以貪污自待。平常在茶餘酒後之際，興高彩烈之時，發乎良心，止乎至理，他們的議論，以為做官必須發財，不發財何必做官，做官而不發財，那是世界無匹一個大傻子。主持正言讜論的也有一面攻擊貪污，一面向官要求津貼。其他學校之籌措基金哪，慈善事業之臨時募款哪，紅的喜事，白的喪事送帖哪，開頭一砲無不向官下手。揣一般社會的心理，總以為官當然有錢，出錢是必要的，錢從何處來是懶得問的。置之不理嗎，似乎失了官的地位，更於面子攸關。如果事必應酬嗎，那你非做貪官污吏毫無辦法。否則固然一掬微俸，不足開銷，就連辦公費，特別辦公費，甚至最近發明的機密費，一古腦掏出來，猶有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之憾。

我次說社會的誘惑了，社會的工商事業，有些可以不倚仗官力的，有些却須倚仗官力的。其不倚仗官力的事業不必說，獨占事業的鐵道，一市內的電力，電車，固要靠官，就是開設一家公司罷，立案哪，登記哪，也要靠官。做官的人往往會想，經他一舉手，一動筆，商人便可以發財，既然商人的財由我而發，然則我為什麼不可稍為分潤。而商人呢，他們的誘惑力也太聰明，官縱不言，他已設想，他們為免現在的麻煩，又想到預免將來的麻煩，送股票，送代金。他們更想你會嚴詞拒

絕，或不好意思接受，在致送之時，有一番預定的堂皇理論，使你覺得於國無損，却之不恭。這是社會上的威脅和誘惑，我言之恐怕還不及十分之一。

我再說朋友的威脅，朋友自然不會拿武力去脅迫你做貪官，但無形的神經威脅比有形的武力威脅更大。例如一般的朋友，他們的房子比你華貴，他們的服御比你奢侈，他們的用度比你龐大，他們的起居比你舒服，其初或者你不感覺，或者你故意不感覺，然而久而久之，你不感覺，你的其他朋友感覺了，尤其你的家庭更感覺了，這樣，一個人的心理自然會動搖。然而，或者你畏清議，或者你畏國法，但久而久之，清議無聲，國法不及，這樣一個人的心理會更動搖。這時內心真正神明昏淆，天人交戰，而且心理更形成一種極端的交錯矛盾，一部分是妒忌，一部分是厭惡，一部分是羨慕，一部分是動盪，最後結果，幡然決定，以爲你既如此，我也何妨一來，我想一個官之不能終其晚節，以這種威脅爲最大罷。

最末，我要說朋友的誘惑了，無論一個人，你做官與否，總有朋友，而且更有些好朋友。到了一個人上台做官，你自己不打算，自然有朋友熱心代你打算。他們上條陳，獻奇計，以爲官是做政治的，今日上台，明日可以下台。既然官場如戲場，應該趁在台上之時，設法籌些政治基金，以便

將來下台之後，作捲土重來之計。假使你是淡泊明志的人罷，就算下台之後不幹政治，但下台之後總是要生活的，最低限度，在台上時候預備些生活費，不止無傷大雅，也是勢所必要。朋友們是熱誠，是好意的，然而做官的却難乎其難了。政治基金是一個概括名詞，究竟多少才能算一個足數，生活費也是一個概括名詞，要多少才可以終餘年。談到基金，談到養老，自然是愈多愈妙了。不過政府是有概算的，最小的機關也是有概算的，項目有時都難於移動，這種特別支出當然無從籌措。除非做官的人不想籌政治基金和生活費，若要籌的話，那怕數目是少之又少，大概要在政費以外想辦法罷！這又是朋友的威脅和誘惑，我言之也不及十分之一。

我想以上兩個例不是中國獨擅勝場，就是外國也視為常事，不過中國還有一種情形，我祇好名之為『特殊化』，那就是親戚問題。一個人有了親屬和戚屬，而又做了官，那種威脅和誘惑，比之社會和朋友更嚴重了，更緊迫了，這些情形，我也不必細談，凡是做過官的人，都可深味此中苦况。因此不止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可爲而不可爲，是值得一般人的考慮，就是赤裸裸而不問廉貪，祇是一個官是否可爲，也值得考慮。

一個官，除非他毫無感覺，除非他甘趨下流，否則他一天到夜，甚至乎上了床睡覺，無一刻不

和社會，朋友，親戚，在那裏苦鬥和掙扎。就算站得住還時時有搖搖欲撲之慮，那站不住的祇有做了社會，朋友，親戚的利用品，到末了更做了他們的犧牲品。

對於這個問題，有沒有辦法來改革呢，那又關乎國家的制度，社會的改造，個人的修養種種問題，已非本文的範圍，非擺出嚴肅的面目不能另行執筆了。

民國三十二年未刊稿

上海的市長

如果有人問我，社會上有沒有別一種職業，或別一種人物像上海市長的呢，我毫不猶疑的——而且我曾經說過：『有、那就是大旅館的經理，更說淺白一點就是 number one boy』。

大旅館的『首席侍者』——我非常尊敬的譯作這個名稱——在火車和輪船將近到埠的時候，必須要打聽班期，派人去接旅客。接到之後，必須帶旅客去看房間。旅客看好房間之後，又必須替他預備點心和茶飯。而且夜間更須在旅客未就寢之前，照顧他們的被褥，在日間還須報告他們市內各名勝，僱車預備他們出遊。

那還不算，旅客們在客廳上滿不在乎的隨地吐痰，高興時候把吸未完的烟頭扔在地毯，燒成沒有圖案的黑洞，更因利乘便在床上懶得起身的時候，把被頭揩鼻涕。他偶一心血來潮，還找到首席侍者，大罵旅館衛生不良，設備不週，禮貌不講，招呼不到，做首席侍者的，祇好笑着臉低着頭，說了無數的道歉話，才鞠躬退下。

我想這就是上海市長，或者就是世界各大都市市長的一般苦處罷。以上幾行簡單的冤詞，祇是一個楔子，我今天想提出幾個做上海特別市市長的條件，以備以後選賢任能的標準，不過，我得預先聲明，我對於我提的條件，我非常慚愧的祇具備了一個。

現在的上海市，有從前等於七個縣治的地方，有將近五百萬的人口，從面積說比任何世界大都市都大，從人口說比著名的世界大都市也不算少。祇是有一件事是特別的，世界大都市的罪惡上海全有，而世界大都市的好處上海却不見得具備。此外我最感覺煩悶的，有外在和內在兩方面難以立刻糾正的特別現狀。

我所謂外在的，就是，世界都市的行政權是統一的，而上海市的行政權是殘缺的。上海有市政府，有公共租界，有法租界，所謂大上海市從前祇大到南市，閘北、江灣和浦東，現在則大到南匯，奉賢、北橋、嘉定、川沙、寶山、崇明，而橫在心胸的兩特區，始終像一個胃癌，內科不能治，外科不能割。因此上海有幾個不同獨立經營的電力自來水公司，有掛着幾個不同國籍車照的車輛，在一張報紙上可以見到三國語言的公告文字，在一個馬路口常見站着幾個不同制服的警察，而且更可以在一個馬路口，找出同一階級同一職務而俸給大相懸殊的三種或四種警察。

我所謂內在的，我也曾說過上海的特別，就在經濟和文化不合一，而正義和法律不合一。爲什麼？本來生活應該和文化相關，經濟也就應該和文化相關，可是在上海是分離的。在上海我們找不到東洋的真正文化，也找不到西洋的真正文化。上海所注重的如何可以囤積，如何可以投機，中國文化人絕無插足之地，就是有也祇可做一般豪門的清客，替他們鑑別假古董，和做一兩篇行狀和壽文。至於西洋先生們，帶來的不是什麼康德，柏格森，或洛克的哲學，所帶來的是捐客的本領，賣貨的宣傳，進一步則是套外匯，買地皮、若更問他們所長，他們可以告訴你，在中國店裏買東西，你千萬要講價錢，不要上當，黃包車夫都是敲竹槓，一用腳踢，他們自然會公平，他們每天讀報紙，先注意的是外匯行情，能夠夜裏在俱樂部內把日簡報紙所載時事談一兩句已是了不得了。因此上海在貿易上是極繁榮的市場，而在思想上倒是極慘淡的沙漠。

說到正義和法律不合一，那是上海人人都知道的公開祕密，上海除了法官和律師之外，還有擁有無數金錢的投機商人，還有擁有無限潛力的高低流氓，這班人專包辦正義與法律矛盾的事業。我暫不批評現在，以前許多法官和律師都有這班英雄來全面支持，來經濟合作，有些是到年終拆帳，有些是零件出賣。如果你公正無私，公館內的英雄可以使你重則撤職，輕則調任，馬路上的英雄可

以重則請你吃生活，輕則也找你講斤頭，談到此地，真可以慨嘆一聲，『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我說了一大套的特殊情形，我的市長條件還沒有提出，大概也爲着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所說的話未免太過於嚴肅了。人家聽了這段話，一定會說『治亂國，用重典』，你是『現任市長，光是訴說是不夠的，你應當拿出辦法。實在說，我對於這種詞嚴義正的責備，自然接收，不過目前也祇能用一個對付新聞記者問話的老調，『未到發表時期，不便詳告』，我還是說說市長的條件罷。

上海市長最好要有語言的天才 我所謂天才，不祇要通幾國文字，更要通南北和江浙的語言。上海真是華洋雜處，人文薈萃的地方，每人有每人的鄉音和方言，而來客來見市長的，又不能以『祇談國語』爲限。我對於蘇州、上海、寧波話都無法分別，更無論乎無錫與常州，語言既無法可通，市長應視爲失職。

上海市長最好要有健全的腸胃 上海市長應酬特別多，外交界要應酬，地方紳士要應酬，偶來視察的中央大員，到中國觀光的外國官紳要應酬，甚而一間新開的戲院要請飯，一家開幕的時裝公司要請飯，你就不厭麻煩，也須極好胃口，我本來有些『食少事煩』的毛病，到了上海真有些望而生畏了。

上海市長最好要有無限的經費。上海禮儀，我想是邁於中國，不論生張熟李，都週到無倫。父母拜壽和逝世，也有通知市長的，甥姪結婚和生子，也有通知市長的。尤其男女三十便拜大壽，父母逝世已歷無數的春秋，還送帖子來做百年的冥慶。做市長的就是秀才人情紙半張罷，這半張紙就與統制物資有關。所以往往接到全紅和栗色的信封，未看內容，先有『不知如何是好』之勢，至於常常對學校，對團體，對醫院的捐款，更是可觀之至了。

上海市長最好有換衣的習慣。上海市長有時每日不忙於別事，而忙於換衣服，早上穿便服，午間便要換禮服，夜間有時還要穿絲墨襟，今年更規定祭孔一定要穿藍袍黑褂。這種的忙碌，有時想起也真可憐。尤其換衣服的時間到了，有個朋友賴着不走，硬說還有些事要詳談，有件公事非批不可，而那件公文其長無比，非看完無從下筆，這種狼狽情形，真非筆墨可以形容於萬一。

上海市長最好要有忍耐的性格。上海市長，不論你如何『臣心似水』，終不能不『臣門如市』，有外賓來討論世界問題，有朋友來研究社會現狀，有僚屬來請示辦法，有人民來申訴冤情，更有同志來詳談。國父當日和他共同革命的情形，個人奮鬥的歷史。如果一日有這樣三個貴賓光臨，那麼那天的公事祇好留中不辦。何況一天來的不止這樣三位貴賓，而下一天的情形還是繼續有效。

。在秋高氣爽時候，精神還可支持，若在夏天氣壓太低，胸頭均脹，貴賓未行，而市長已筋疲力盡。我是一個未能幹平躁息的人，對於這種情形，祇有敢怒而不敢言，咽一口氣下肚子來忍受。

上海市長最好要有不同的臉孔 一個上海市長在公共場所露面的時間太多了，而所見的人物種類也太廣了。你願意不願意由你，見了總要說幾句客套話，否則人家要說市長太驕傲，或者是太乖僻。一位頭腦頑固的老人家，你必得和他說說他舊學湛深，道德高尚。一位窮兇極惡的大英雄，你也必得和他說說急公好義，俠骨豪情。你想在這個場合之下，市長不可為而可為，抑可為而不可為呢？

上海市長最好要有廣泛的常識 我時時想上海市長應該要天文地理無所不通，諸子百家無所不讀。來賓來見市長，有些談政治，有些談科學，更有時你還要懂一些工程，最好的你更要知道一些農業。那邊不算，倏然來一女賓要和你談婦女問題，美術家來賣畫的更要和你談些畫學原理。你若不懂，他們會批評你失儀，你若裝作懂的，他更高興談下去，你就不能再見別位來賓和批辦公事。因此我更想上海市長不但要有廣泛的常識，最好能夠像西遊記的孫悟空有拔一撮毫毛變了千萬化身才可應付。

條件我想還有許多，不過在一篇短文是說不清的，而且也不好說得太清的，若是說得太清，這篇遊戲的短文，變了後任的嚴重警告。此外身體方面，恐怕還要具備些少條件，就是上海市長要有十分強壯的心臟，帶些麻木的神經，眼睛要半閉，耳朵要半聾。我敢坦白承認我在所提條件之中，有一個天然的具備條件，就是我的耳朵真是半聾的。我一次曾去就教李岡醫生，問他我將來會不會變聾子。據他檢查結果說，耳神經還沒有壞，大可不必治療。不過我的耳病是早在小孩子時候，自己好取耳朵爲樂弄壞的，那裏知道今天倒爲我做市長條件之一，可見『雖不信命，自有前因』，天下事得毋真有前定之事歟！可怪也已。

民國三十一年稿

海異

海異兩個字有點像聊齋誌異中記載神仙狐鬼的題目，是的，我所謂海異，縱然不是記載神仙狐鬼，也是記載我所認爲近於一種魍魎罔兩的怪異。

諺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如果一個人是信鬼的，他見着風吹草動，也認爲是一種鬼神，如果一個人是不信鬼的，那怕怪異當前，也視若無睹。不過，你不怪是可以的，那怪會自敗也可能的，但它是一種怪，而那怪又儼然給你看到，那你總不能根本否認它的存在罷。

我是一個廣東人，居留上海那麼久，所見的怪事真太多了，而且怪事又會日新月異，層出不窮。當然我以爲怪的，上海人或者不以爲怪。我不以爲怪的，上海人或者才認爲真怪。自然有人會說，你是一個廣東人，廣東僻處嶺南，孤懸海澨，廣東人到了上海，等於紅樓夢的劉姥姥初進大觀園，因於習俗之不同，人情之互異，帶了一身的土氣，驟然高登大雅之堂，見了大觀園的西洋鏡也是怪，見了賈府門口的石獅子也是怪了。這一點我也承認的，不過我遊過的地方也不少了，見過的事

物也算多了，上海的怪事，不但廣東人視爲神奇，就是東西南北之人無不認爲特出，此而不記，則以前許多筆記的紀異可以不作了。

現在題目取一個『海』字似乎不能代表上海，平常我們喚上海簡稱之爲『滬』，雅一點稱爲『申』，但近年似乎已經習慣了，人們往往拿一個『海』字就代表上海，我現在命名海異兩個字，還是胎於海派兩個字而來。要是我不錯的話，海派兩字的來源，好像是上海唱戲的大別於北京來的所謂京朝派而說。上海平劇自然傳自北京的戲劇，不過它的腔調，它的功架，到了上海，就似乎應該加以修正。在京朝派的眼中，以爲海派是太不合規矩了，離乎正宗而近乎左道了，可是上海倒不因爲不合規矩而沒有人去看去聽，反因不合規矩而特別賣座和客滿。京朝派如果是一個識時務的俊傑，祇好也從而修正，學些上海作風，若緊守繩墨自命皓首窮經的老伶工，祇可在無可奈何之中，長嘆一聲呼爲海派。自從海派兩個字成立，上海無論何事凡與衆不同的都名爲海派，而且含有一些神祕性了。我不知海派兩字是不是有挖苦之嫌，抑含有標新之意，我既難於找一個簡單題目，就順手取這海異兩個字。

在我一個廣東人看來，上海的異點的確太多了，可是異點也就是特點，一個地方，或者一個人

，有了特點，你贊成也罷，你反對也罷，它是巍然存在，不容諱言，也不必諱言的。我時常在想，假使上海有十八層的話，我居留上海四年，最多祇能摸到第十層。又假使上海原是十八層的話，七年以來，上海至少又增加了十八層。其實，我自命摸到第十層，恐怕還是大言不慚，我所感覺的不過是上海一個浮雕，若果真把這十層的地下生活摸清楚，至少可以寫一百萬言的『上海人物風俗誌』。我這篇海異是與國計民生無關的，我得聲明祇是一種聊供記憶的速寫。

我居留上海不久，最初使我驚異的是上海人的慶壽熱，廣東和其他地方的人，在五十歲以前絕沒有聽過拜大壽，因為壽是年齡的積算，人既未老，壽從何解。可是上海倒不然，好像每個人都自算是短命的，三十不拜壽，便沒有做壽的機會。我尤其驚異的，是上海人替父母做百年冥壽，一班親友像煞有介事大捧其場，諺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上海則似富貴不替已死父母做一下冥壽，面子不足。死與生是相反的，死而言壽，則不必樂生哀死，不必求神拜佛妄冀延壽了。

我更驚異的，不知從何朝代開始，上海更有大收乾女狂，聽社會的傳聞，看小報的記載，差不多上海的名人每日都在那裏做過房爺。我也知道，中國人有討人便宜的惡風，不是以老子自居，便罵到人的祖宗三代。不過自稱老子也祇在口頭說說，聊且快意一時，而上海則不然，倒不是一種口

頭便宜，而是時髦風尚。又難得許多小姐們樂得『謂他人父』，恬不爲奇。年紀一大把的人做人家的寄父和乾爹，還可以說十年以長，可以父事，但流風所煽，連二三十歲的毛頭小子也居然爭着做過房爺了。

上海號稱五百萬人口的都市，人多事亂，理所必然，小開多自然癩三多，白相人多自然閒人多，有閑的人多自然票房多，跳舞場多，咖啡室多。有錢的人多自然賭場多，堂子多，又自然而然而女人多。不過據我細心觀察，上海人還是『山人自有道理』，不至於像一般人所想，毫無尺寸與規矩的。例如三十可以做大慶似乎可異了，我從沒見過二十歲的人拜大壽，可見二十和三十之間似乎是有界限的。替父母做百年冥壽是可異了，但替始祖慶千年冥壽的倒史無所書，可見送帖子的人是有過打算的。廣收過房小姐是可異了，但所收的畢竟以做戲和唱書的女藝人爲限，有時舞女也可破格錄用，而沒有一個人破格光顧到孤兒院的女孩們，可見乾女兒也有一個被默認的資格的。而且就是大出喪罷，前導的要僱一個騎馬印度巡捕是不可少的，因爲這是以壯聲勢。外國樂隊和中國樂隊，只管不大調和，也是必要的，因爲這是擺排場。僧，道，尼，夾雜着沿途擊鼓敲鏡，誦經念佛，也是必要的，因爲這是裝門面。但究竟沒有人敢於去發明儒釋道三教同源的至理，請一班教書先生

雜於僧道之羣，沿途大念其大學中庸，以補亡者平日讀書之不多，及在生前見理之未到。照這樣看來，上海畢竟皮肉內還有陽秋，而心中自有繩墨的。

這樣，左又不以爲異，右又不以爲異，然則所謂海異又在那裏呢？

我認以爲異的，是上海獨有而全國所無的所謂聞人，所謂大亨。聞人是上海的特產，這兩個字也是上海所發明。要下聞人兩字的定義，極其困難，似乎大家都默喻於心而難釋諸口。我非常佩服上海能夠發明這兩個字，這個發明人一定是具有非常的天才，真可謂發地鬼之藏，洩天人之秘的。聞人在社會上似乎有他不明白的地位，可是具有實在的權威，往時在租界時代，外可以勾洋人，內可以通官府，巡捕房有大幫的兄弟，而馬路上有一羣的門徒。他的決定，可以使輿論無聲，可以使法律失效。報館記者敢於罵政府，却不敢批評當地的聞人。現在似乎是時移勢易了，不過聞人餘威，還是隱然存在。舊的聞人未老，而新的聞人又生。這樣生生不已，代代無窮，我默念將來，上海要成一個聞人世界，可以無政府，無法律，無是非，百姓可以無納糧之麻煩，而有安居之舒服。上海一旦化爲這個世外桃源，自然會有一個陶淵明先生來作一篇新桃花源記。

我認以爲異的，上海這一塊地雖不大，却似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洪爐。最愚笨的人到了上海不

久，可以變爲聰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變爲狡猾，最古板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變爲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一小時便可以變爲髮髮美人，單眼弦和扁鼻的女人，幾天之內便可以變爲儀態萬方的太太。從前我發過一個奇論，要一個子弟由愚魯而化聰明，最好使他到報館工作，因爲報館是消息的總匯，社會的神經，一個青年進了報館，耳濡目染，知識是多面了，經驗不單純了，就是一個白癡的人，恐怕也白癡得出類拔萃。現在我可變了議論了，要一個子弟由愚魯而化聰明，最好使他住在上海，最少他可以知道社會的黑暗裏面，而不會白着眼睛上人家的當。如果父母任其自由，不加管束，保證他在最短期間，懂得穿西裝，懂得跳舞，懂得愛女人，更懂得花錢。上海的神奇，就神奇在此，我們那能不引以爲異而驚嘆呢！

我認以爲異的，或者上海真是給英美麻醉了罷，我所謂麻醉，並不是每個人都迷信英美，却每個人都崇拜外國人。祇管他調門唱得很高，對於外國人無不低首膜拜。中國人是著名泱泱大度的，對外國人什麼都可以讓步，什麼都可以服從。我也見過許多人，天子不得而爲臣，諸侯不得而爲友，而對一個階級最低，地位最下的外國人，則心甘情願爲廝僕而不辭。他們的內心也很簡單，以爲外國是註定壓迫中國的，所以被壓迫是絕無異詞，而中國政府則是自己人，一不合乎脾胃，立刻要

提異議。這個理由，我以為應該原諒的，不過對於中國政府的有命令不服從，而對於外國流氓無理要求倒退讓，似乎多少總應該該讓的罷。其甚者竟假外國人的勢力來壓中國人，來壓中國官吏，這似乎更應該讓的罷。呵，人是要生活的，而生活的欲望照經濟原理解說是無限的，於是，爲着生活，爲着欲望，借外國人的勢力壓壓中國人也是應該原諒的呵！

我認以爲異的，上海是中國一片土，而這片土倒像另一個星球，有不同的氣氛，有特殊的環境，一個人到了上海，思想也變了，行爲也變了，好像氣質不變，則不能適者生存，等於一種微菌，要改變他們的習慣性，適於一定的溫度，才可以生存一樣。上海對於法律的觀念很是淡薄的，對於道德觀念也很是淡薄的，乃至對於中國的夙昔信條也很淡薄的，一個人在別的地方不受嗟來之食，而到了上海反可以痛飲盜泉，以爲上海是另一世界，風骨一說是不能成立的。一個人在別的地方反對官僚和軍閥，而到了上海倒樂於爲豪門清客和廝養之徒，以爲上海是另一個世界，清高一事，暫可置而不論。這種往例和現例也太多了，爲什麼不可思議到這樣？我祇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因爲上海是上海！

如此這般的異事，真是數不清，說不盡，如果有一個有心人肯埋頭研究，倒可以找出無數有價

值的材料，對於社會學有新的發明。誠然，凡是到上海的人，誰不希望淘些金，誰更懷着有心世道之旨來奉揚仁風，布育文化。然而上海是一條滾滾流不盡的黃浦江，淘得着金的，便捧着這塊金，醉生夢死，載沉載浮。淘不着金的，便越淘越深，一旦風起潮來，隨波而逝。

上海原來是一角荒灘，不過百年，便聚了許多衆生，造成這麼一個奇異世界。有人說，上海本來沒有異事，有儉樸的老太太，有謹愿的鄉下人，所以有異事，就因為四方八面的英雄豪傑都聞風而來，集異事之大成，更變本而加厲。我想這個解釋，或者有相當理由，姑且就認這個理由爲對罷，但同時我又想，倘我們要上海復爲一片乾淨土，是不是要來一次陸沉，或者來一次大掃除。

民國三十一年未刊稿

跋

寒風集算是由搜集，編排，而至出版了。這一本散文集雖然是薄薄的一本，但也費了許多時間和精神，第一，搜集就是一件麻煩的事，因為我向來有不留稿的脾氣，過去的文稿有些出版在十年以前，而刊出的雜誌又不止一家，在今日搜集起來，不獨沒有自己的存稿，並且難於尋覓以往的雜誌。第二，編排也是一種困難的工作，文集比不得論文，過於審美，流於纖巧，過於粗率，又失了文藝的氣息。一編一排，殊耗精神。第三，校勘更是一件繁重的事情，校書如掃落葉，其麻煩可知，何況紀事之文前後互見，當日隨意寫來而今日刻意校勘，真非兩三回可以告竣。這次寒風集的出版，由搜集，編排，而至校勘，都由國康始終其事，而且她對於寒風集的出版，特別感覺興趣，沒有她的始終不懈，恐怕這本文集的出版還要待若干時。就是這幾年間的文存，由二十九年，三十和三十一年，乃至正在編輯中的三十二年文存，都是她慘淡編刊，於此是應該一記的。

本集分爲甲乙兩篇的原因，原爲着甲篇是紀述事實的，乙篇是抒寫感懷的。對於甲篇的文章我

想以後不再寫了，再寫便牽到政治的實際問題，那是在散文集以外的性質，原有許多寫作都度在柵裏沒有付刊，就是再寫也不想編印了。至於乙篇，是不是還有續稿呢？我自己也不敢斷定，腹稿雖然不少，但下筆便有許多困難，發刊更加有許多困難。這些困難是不是可以說？事雖微細，卻有難言之處，例如這本集內乙篇中就有好幾篇文章是寫好了而沒有應朋友的要求付刊的。寫文章是我所愛好的，可是環境似乎不許我那樣直率去做！

要幹不能痛快的幹已是苦事，連寫都不能痛快的寫更是苦事，有些人是薄文人而不爲，我獨羨慕文人而不能爲，安得有日擺脫盡那些勞什子，痛痛快快的寫盡我要寫的事和說盡我要說的話呢！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公博跋於上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三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再版

版權所有

寒風集

定價國幣壹仟伍佰圓整

著作者 陳 公 博

發行者 地 方 行 政 社

上海愚園路六〇八弄一四四號

印刷所 中 國 科 學 公 司

上海洛陽路六四九號

經售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782.776 7584 7584
2065154

100/100
wh

單位	總圖書館CL
來源	北京大學圖書館贈
登記	90.8.2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065154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065154